



# 我和红 26 军

---

谭生彬 回忆



## 谭生彬同志简介

谭生彬，男，字志博，汉族。陕西省延长县安沟乡阿青村人。1912年5月18日生。1926年上半年在延长县第一高小读书时参加革命。1927年4月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冬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任延长特区团区委书记、党区委委员。

1933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红2团），任骑兵连1班战士。

1935年5月刘志丹、高岗率红26军、红27军解放延长后，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6年初，发动组织全县军民大力支援东征，成绩显著，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鼓励。

1936年2月至12月，领导延长军民坚持了七个月的游击战争。

1937年1月，任延长市委书记兼市抗日救国会主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暂由王子瑞副主席代理）；5月，任东地（分区）专属二科科长。

1937年10月，延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任第一任县长。

1940年10月至1949年9月，历任：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民政厅视研室主任，陕甘宁边区延安大学行政系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党委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党委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代主任。

1945年当选为七大代表。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10月，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合并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

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950年4月至1958年4月，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监察部二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级）。

1958年4月至1963年1月，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3年1月至1965年10月在中央党校学习。其间，由党校组织，在河南省新乡专区七里营公社参加了七个月的四清。

1965年10月至1980年5月，历任：化工部锦西化工厂副厂长，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化工部科技局顾问。

1979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谭生彬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也是坎坷的。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因所谓“习、贾、刘反党集团”案和所谓“《刘志丹》反党小说”案，遭到政治迫害。此后长期被降职使用，达18年之久。

1980年5月26日，谭生彬同志在北京病逝。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6月17日作出了《关于为谭生彬同志平反的结论》。为谭生彬同志正式平反，昭雪沉冤，恢复了名誉。

1980年6月28日，谭生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隆重举行。

1980年6月30日，谭生彬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追悼会由余秋里副总理主持，化工部部长孙敬文致悼词。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乌兰夫、余秋里、彭冲、宋任穷、李井泉、康世恩、薄一波、江华、黄火青、康克清、杨静仁、刘澜涛、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史良、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敬献了花圈。



1933年夏，红26军被杜衡断送，在终南山惨遭失败。谭生彬同志突围回到延长后，在延长党组织与陕北（甘）特委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串联党员，宣传革命，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1935年5月底，刘志丹、高岗率红26军、27军主力，激战三小时，一举解放了延长县城。延长解放后，谭生彬同志先后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任第一任县长。

在谭生彬等同志的领导下，延长红色政权不断巩固发展，全县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东南门户和抗日前哨。

（这张照片是1938年谭生彬同志担任延长县第一任县长时拍摄的）



1940年10月，谭生彬同志调离延长，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先后任边区粮食局局长、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民政厅调研室主任、延安大学行政系副主任、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1945年9月调联防军政治部到后来的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谭生彬同志在担任组织部长的几年时间里，始终坚持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择原则，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我军的组织建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张照片是谭生彬同志1950年初拍摄的，当时任一野暨西北军区政治部代主任、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政权急需巩固，经济急需发展，人民急需安定，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干部。

1950年3月，谭生彬同志响应中央号召，主动请求转业，再次离开了他钟爱的部队，带领一批干部转业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务。他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忘我工作，打击、惩治了许多坏人，挽救、保护了不少同志，为建立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国家的人民监察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张照片是谭生彬同志 1954 年拍摄的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西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1955年2月17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第0507号任命书，任命谭生彬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工业监察司司长。谭生彬同志奉调进京。

1955年，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否按时完成“一五”计划的决定性一年。为保证“一五”计划的完成，谭生彬同志领导年初刚刚组建的工业监察司，对全国工业系统存在的一系列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严厉的查处。办案过程中，谭生彬同志身体力行，亲自深入第一线。在1955年一年中，谭生彬同志在工矿企业出差的时间就达10个月之久。

1957年底，“一五”计划规定的全部任务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这胜利中包含着人民监察机关不可磨灭的功勋。

1957年7月18日，周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085号任命书，任命谭生彬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助理。他铭记党的重托，在这一岗位上尽职尽责，协助钱瑛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

（这张照片是谭生彬1957年夏在家中拍摄的 时任监察部部长助理）



1958年4月，中央监察部撤销，谭生彬同志调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先后分管财贸和文教等工作。他不顾严重的心脏病，经常深入高寒牧区，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为早日改变青海省落后面貌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在中共青海省委三届七次会议上，因所谓“习（仲勋）、贾（托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案和“《刘志丹》反党小说”案，遭到政治迫害，被错误地撤销书记处书记和常委职务，送中央党校学习，蒙冤达十八年之久。

（这张照片是1962年春谭生彬同志进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时在颐和园拍摄的 时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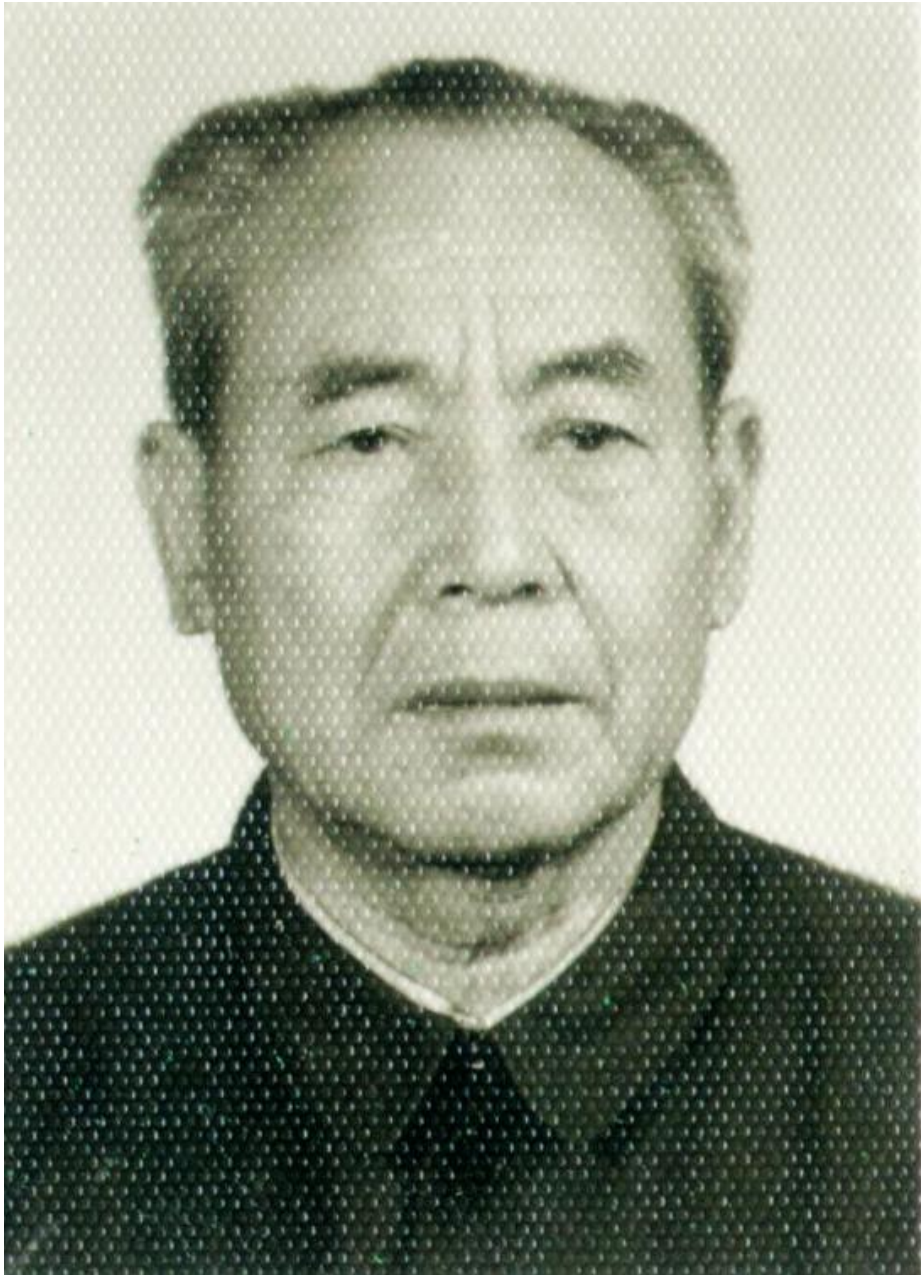


1963年1月，谭生彬同志被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期调中央党校学习的还有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名为学习，实为改造。在此期间，由党校组织，他和几百学员一起，到河南新乡专区七里营公社参加了七个月的四清，同那里的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5年10月，谭生彬同志党校毕业。因他在学习期间始终对青海问题持保留意见，被视为坚持错误，学得不好，下放燃化部锦西化工厂任副厂长。谭生彬到锦化报到后，为尽快熟悉该厂情况，先搞了几个月四清，1966年3月正式接手领导工作（分管人教）。他将自己的冤屈深深埋在心底，事事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爱戴和尊重。

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谭生彬同志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再次遭到残酷批斗和迫害，在锦西化工厂的“牛棚”里被整整关押了3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家属也受到株连。

（这张照片是谭生彬同志1967年夏在锦化一字楼宿舍门前拍摄的。之后不久，便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



“文化大革命”使谭生彬同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也正是通过这场“革命”，经“造反派”外调发现，经毛主席亲自批示中组部调查，终于澄清了他 1962 年在青海因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案遭批判、被撤职的千古奇冤。

1974 年 1 月，谭生彬同志调回北京，任石化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他十分珍惜重新获得的工作权利，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1979 年 2 月，谭生彬同志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他把在接近古稀之年重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队伍看作是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最大信任，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气力，为自己舍生忘死、忍辱负重、毕生追求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最后的贡献。

（这是他回京后照的一张照片，形虽樵，神犹在）



长期以来，面对政治冤屈，疾病折磨，谭生彬同志始终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这张照片是他临终前半个月拍摄的。

（1980年5月11日摄于北京医院）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前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

## 谭生彬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送了花圈



谭生彬同志遗像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前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谭生彬追悼会，6月30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谭生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0年5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乌兰夫、余秋里、彭冲、宋任穷、李井泉、康世恩、薄一波、江华、黄火青、康克清、杨静仁、刘澜涛、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以及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人大常

委会法制委员会、化工部、中共青海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延长县委、锦西化工厂等单位，送了花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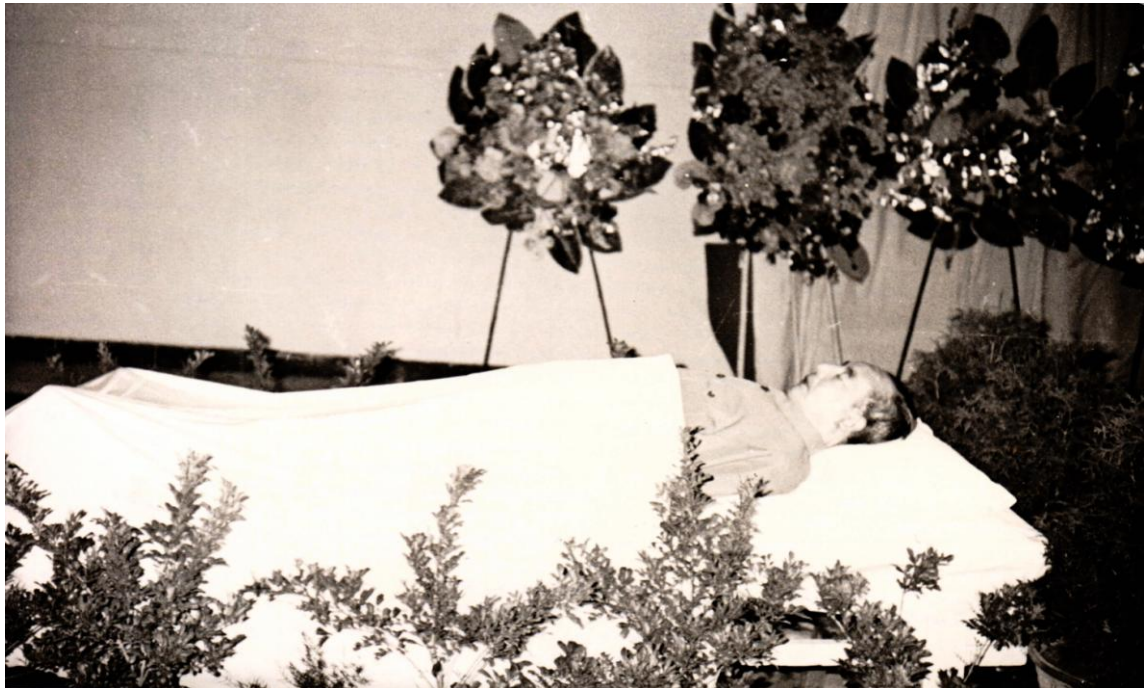
余秋里、康世恩、刘澜涛、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谭生彬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化工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群众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化工部部长孙敬文致悼词。

悼词说，谭生彬同志是陕西省延长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参加革命后，历任陕西省延长县共青团区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长，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延安大学行政系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工业监察司司长、部长助理，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化工部锦西化工厂副厂长、原石化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

悼词说：谭生彬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惧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带领延长县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创建、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积极组织 and 发动全县军民大力支持东征，成绩显著，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鼓励。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被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部队做组织工作，忠实地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新中国成立后，谭生彬同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满腔热情地忘我工作。他曾长期从事人民监察工作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纪律检查和人民监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忠于职守，不徇私情，为建立和健全人民监察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做出了积极贡献。

悼词说，谭生彬同志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优秀党员。他在被错误地撤销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调到化工部锦西化工厂任副厂长以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兢兢业业，努力工作，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原则。过去对谭生彬同志的错误处理，现已纠正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粉碎“四人帮”后，谭生彬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且身体力行，为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出了良好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延长人民的好儿子谭生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0年5月26日凌晨3时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68岁。

图为谭生彬同志遗容。谭生彬同志的身上，虽然没有覆盖那面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鲜红的党旗，然而，那条洁白的布单，此时此刻，显得是那样质朴、无暇，恰恰衬托出了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1980年6月28日摄于北京医院告别室）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乌兰夫、余秋里、彭冲、宋任穷、李井泉、康世恩、薄一波、江华、黄火青、康克清、杨静仁、刘澜涛、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史良、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谭生彬同志敬献了花圈。

(1980年6月30日摄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谭生彬同志的许多老首长、老战友敬献了花圈

(1980年6月30日摄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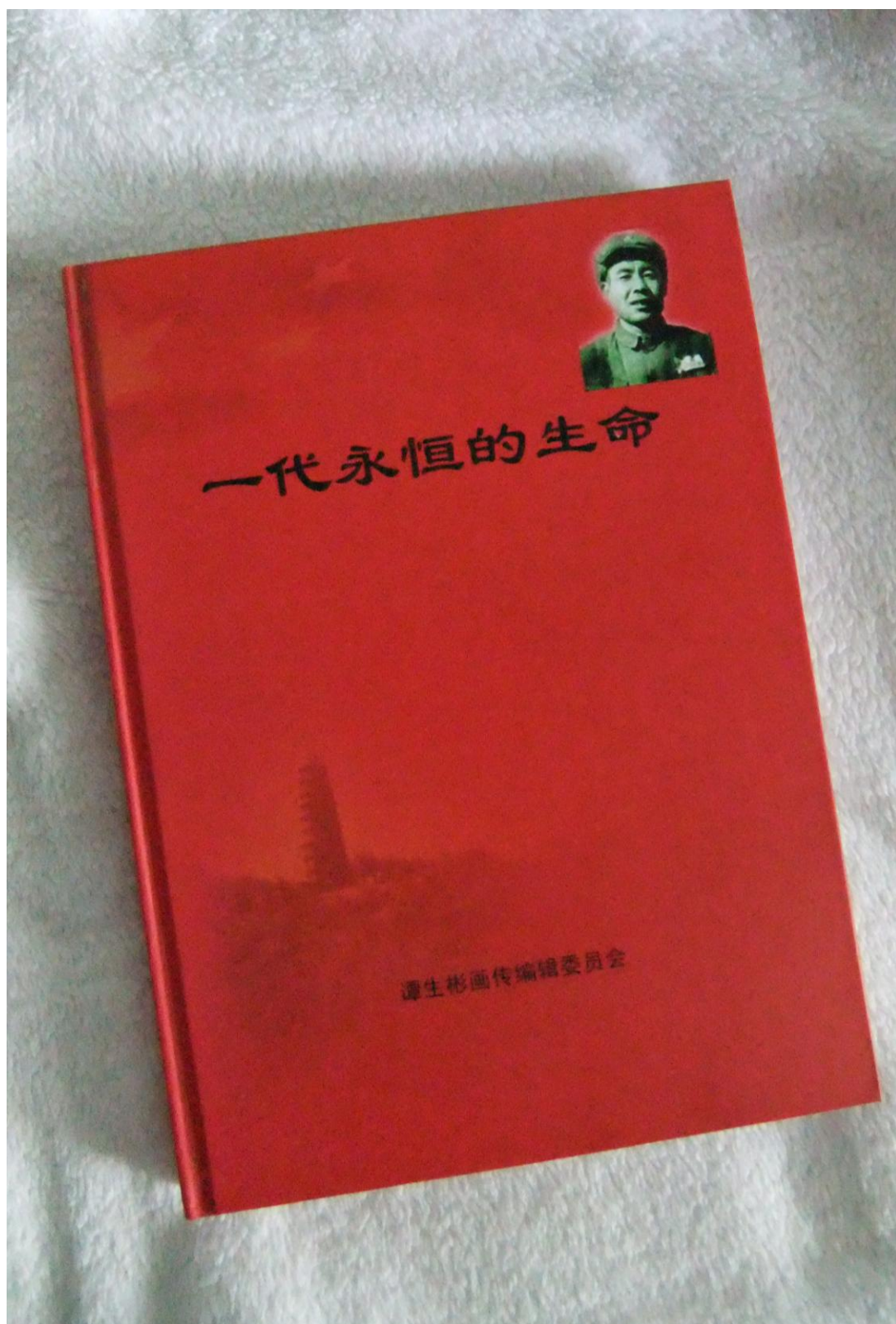


谭生彬同志追悼大会 1980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会由余秋里副总理主持，化工部部长孙敬文致悼词。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谭生彬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化工部及在京直属单位群众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图为谭生彬同志夫人李光宇同志率子女敬献的花圈。

(1980 年 6 月 30 日摄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在纪念谭生彬同志百年诞辰的日子里，谭生彬同志子女编印了这本《画传》。它记录了谭生彬同志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承载了儿女们对敬爱父亲的无尽思念



图为谭生彬同志陈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集团军（前身为红15军团，所部116师前身为红26军）军史馆的照片。这是他一座永远的丰碑！

（摄影 刘国辉）



# 目 录

---

（一）一段让父亲自豪的历史（代开头语） .....	2
（二） <b>我和红 26 军</b>	
阿青的儿女（自序） .....	4
参加红二十六军 .....	7
血战终南山 .....	10
战士有泪不轻弹——终南山突围中的几个小故事 .....	14
回陕北去 .....	18
志丹同志让我留在地方 .....	21
附录：谭生彬大事年表 .....	26
（三）无尽的思念	
我们的父亲 .....	37
父亲追悼会二、三事 .....	54
家父谭生彬百年诞辰祭文 .....	58
长诗：怀念我们的父亲（代结束语） .....	60

# 一段让父亲自豪的历史

(代开头语)

“当年陕北闹共产，父辈紧跟刘志丹。  
血战终南洒热血，命悬瓦窑当笑谈。  
功成不争名与利，身正哪怕屈和冤。  
革命接力有后人，黄土情深永相传。”

这是我们在祝贺“黄土情联谊会网站”开通时写的一首诗。诗的文字虽拙，但从某种意义上，它恰是我们陕甘边苏区、陕北苏区老一辈革命人生的写照。

我们的父亲谭生彬，1933年2月参加红26军（红2团），经历了“兵败终南山”——红26军军史上最悲壮的一页。父亲在红26军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红26军感情之深厚，让我们感动。在他眼里，当一名红26军战士，比当省委书记更让他感到自豪和光荣。

《我和红26军》收录的几篇文章，是我们根据父亲生前的文字和叙述，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画传《一代永恒的生命》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有些情节在《画传》中没有提及）。文章以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形式，忠实记录了父亲在红26军的经历，记录了老人家和红26军那段割舍不去的情缘。

如今，我们的父辈们大已仙逝。但他们当年“紧跟刘志丹闹共产”的事业还在，还在发展。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随着腐败、剥削、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的逐步消除，随着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步实现，再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变得比现在更加强大，我们的人民一定会变得比现在更加富裕，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美好——让我们以此来告慰天国里的父亲和他那些长眠在终南山区的战友的英灵吧！

谭永毅、谭元媛、谭永林

2013年清明

# 我和红 26 军

谭生彬回忆

# 阿青的儿女

## （自序）

阿青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里，她为我们党输送、奉献了许多优秀儿女，谭生彬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1926年，谭生彬同志走上了一条终身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革命道路。他搞过学运，搞过农运，搞过兵运；当过普通士兵，也当过省委书记……历尽磨难，无怨无悔。当时，年仅十四岁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严酷斗争的磨砺，会使他成为延长红色政权的创始人之一，成为延长人民家喻户晓的英雄，成为我党一位久经考验的高级领导干部。

—— 编者

1912年（民国元年）5月18日，我出生在陕西省延长县安沟乡阿青村一个农民的家庭里。我们村子在延长县东南方向，距县城六十华里。

这个村子，历史上曾有少数民族聚居。村名沿用的是那时的名字，“阿青”是它的译音。村子所在的这个塬，因此得名为“阿青塬”。村里，有前人为防兵灾匪患修筑的寨子。村边又厚又长的围墙，围护着村子的安全。村东十里的地方叫童儿湾，海拔1300多米的延长最高峰姑姑山就座落在这里，梢林茂密，鸟瞰全县，很是壮观。这是一个以谭姓为主的户家村，外姓人只有很少几户。

“谭生彬”这个名字是父亲给我起的。上学后，村里的私塾先生又给我取了个“字”——“志博”，意喻“志向远大，博学多才”的意思。参加工作后，刚开始填履历表时，我把“元年”当成了“零年”，于是乎出生年代便填成了1911年。后来知道填错了，也就随它去了，不再改了。

我家有三孔窑洞，八寻土地，牛、驴各一头，成分贫农（1935年土改时核

定的)。父亲谭正芳毕生为农。他身材高大，留着几缕三羊胡，颇有些风度。他的一生是在村里度过的，竟然连县城都没有去过。

父亲的憨厚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没有见过世面的他，1951年来西安小住时，竟然拿着烟锅在电灯泡上对火，一时成为全家人的笑谈。

我八岁丧母。母亲（肖氏，多海村人）亲切的话语、和蔼的容颜，至今还经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特别是当我遇到困难，受到屈辱的时候。

我上过五年小学。这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已经是很有学问，很了不起了。最初的两年是在村里小学（私塾）上的。我很庆幸父亲能让我去上学，我一生都因此而受益。我很珍惜，读得很用功，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不仅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懂得了许多为人处事，惩恶扬善的道理。在课余时间，我经常帮家里干活。放牛、割草、捡粪、拾柴……什么都干。虽然辛苦，但很愉快、很充实。

为了我的前途，尽管家里并不宽裕，父亲又于1926年上半年，用借高利贷凑的钱（家里的牛、驴都被放高利贷的人拉去抵了债），把我送进了城里的第一高级小学。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全国革命热潮高涨，延长也不例外。革命形势的激励，校园氛围的熏陶，共产党员老师的引导，革命刊物的启蒙，使我对共产党及其奋斗目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积极参与到她的革命活动之中。

1927年4月，这是我个人乃至我们党都应该牢牢记住的历史时刻。此年此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忠诚的后备战士；也是此年此月，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无数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屠刀没有把我吓倒，反而更坚定了我革命到底的决心。翌年年底，我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我走上了一条终身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革命道路。如今，屈指算算，我在这条路上已经整整走过了五十个年头，历尽磨难，无怨无悔……那时，我差一个月才满十五岁。

我们是阿青的儿女。在那乌云满天、索求光明的年代里，阿青用她那母亲般的胸怀，为我们党哺育、输送了大批热血青年。他们中有的早已牺牲，有的至今仍坚持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只是他们中间普通的一个。

我的胞兄谭生焯，1927年入党，曾任阿青村党支部书记。1936年6月，国民党军趁红军结束东征，回师西征之机，开始了对陕北苏区的进攻，延长也在其中。是年7月，我兄在一次外出侦察时被敌人抓住。还乡团匪扒光他的衣服，用烧红的铁锨狠命烙他，烙得他体无完肤，竟连××器都给烙掉了……他忍着强烈



剧痛，骂不绝口，最后被敌残酷杀害。时任延长二区（安沟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年仅 30 岁。

我的堂弟谭生煊，作战勇敢，人称“灰老谭”，在西北野战军六纵新四旅三团任营长。1948 年夏西府战役中，他率部掩护总部机关和大部队转移，在甘肃屯字镇与马匪骑兵拼死搏杀，完成任务后壮烈牺牲，连尸骨都没有找到（详见纪念谭生彬同志百年诞辰画传《一代永恒的生命》之《烈火铸金刚》）。

我的堂弟谭生李（又名谭顺奇），红 28 军战士，在定边作战时牺牲。

我的堂祖父谭万隆，1935 年参加革命，在平型关战斗中负伤致残……

他们都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我们党的伟大事业！

还有我的堂弟谭生晟、谭平（原名谭生财），他们都早在 1935 年就已参加了革命。经过党几十年的培养教育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考验，都已成长为我党的高级干部，现分别在内蒙呼市和陕西西安工作。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更有我的堂兄谭生福、谭生祥、谭生肖，胞侄谭永明、堂侄谭永昶等，都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他们当年提着脑袋为党工作，现在无有一官半职，终身在家务农，没有丝毫的抱怨和索求……

我的爱人李光宇，也是一位 1935 年就已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那时她才 14 岁，跟着大人闹红，从没含糊过。她长期患病，仍坚持工作，在党的机要部门和信访部门的具体岗位上做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工作。

还有我的儿女（永泰、燕子、永毅、元媛、永林等）、侄辈（永清、永义、永财、永丕、永安等）、孙辈（志仁、志远等），他们也大都是共产党员，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勤奋地工作着……看到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看到我们阿青的后代这样争气，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两次入伍。第一次是红军（红 26 军），第二次是解放军（西北军区）。按年头算，我在这支人民军队总共奋斗了七年！参加红军已经是 47 年前的事了，参加解放军也是 35 年前的事了……但是，不管到什么时候，这支军队的那种绝不屈服的战斗意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都在激励着我永远向前！做为人民军队的一名老战士，做为阿青的儿女，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骄傲地直面这块生我养我的红色土地，都敢拍着胸脯对着她大声地呼号：敬爱的母亲，您的儿子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

## 参加红二十六军

1932年5月，谭生彬同志发动并亲自领导了延长县历史上著名的围城抗粮抗款斗争。数万农民，围城10日，取得了减缓粮款的重大胜利。他在延长的一系列活动，使国民党反动县政府十分震怒。为躲避敌人抓捕，他逃到西安，找到党组织，继续坚持地下斗争。1933年2月，他与曹士荣等人赴陕甘照金根据地参加了红26军，成为刘志丹同志领导下的一名骑兵战士。

—— 编者

1932年5月，在领导延长数万农民取得围城抗粮抗款斗争胜利后，我离开皇庆寺小学回到本村阿青。

一回村，我就参加了村里的变工队，经常到外村干活，不定行踪，以防反动派报复抓人。果不其然，6月下旬，县教育局朱镜清（共产党员）托上段家村肖元吉给我捎信、刘生馨老先生（进步民主人士）也亲自上门告知，都说已得到王俊杰（国民党县长）要抓我的确切消息。我立即决定离开本县，到西安躲避。刚好高洪笃同志回西安（他在西安上学，回来过暑假的），约好结伴同行。

朱镜清同志以教育局的名义为我办好了去西安的护照，并发给教学薪水26元（当时用的硬币），作为路上的盘缠。加上亲戚给我的1元，共27元。有了这27元，腰杆子硬了许多。

我和高洪笃从阿青出发，经宜川过黄河，再经山西河津、运城从风陵渡渡河，经潼关、渭南等县，于8月初到达西安。此时身上只剩下3毛钱。

到西安后，我找到董耀卿同志（当时他在西安一家洗染厂做事），在他那里落下了脚。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因一时找不到工作，囊中枯竭，吃的、穿的都是董耀卿同志“供应”。有时也到高洪笃处吃“大户”——我吃，他掏钱。

10月初，董耀卿通过他的社会关系，为我在城关区立第一高小谋到一个职

位：担任初级部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每月 12 元薪水。担任教师后，我与西安各学校间的交往渐多。终于于同年 11 月份，通过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康寿山找到了党的关系。康寿山同志当时是省立第一师范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是延长康家沟村人。大革命后期，在甘谷驿二高上学时，就已是共产党员。

接上党的关系，就象孩子找到了娘。我放弃了“再找不到党的组织，就去张家口投奔抗日同盟军”的打算，在康寿山同志的具体领导下，一门心思地在西安搞起了地下工作。我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经常利用晚上到街上写标语，撒传单，十分活跃……

1933 年 2 月，我向康寿山同志提出了去陕甘红 26 军的要求。康寿山同志欣然同意。他找到陕西省委的同志，报告了我们要求参军的情况，请陕西省委给陕甘特委开了介绍信。当时同去参军的，除我外，还有马德林（康寿山的同学，延川人）、马宜超（榆林六中学生，佳县人）、曹士荣（榆林六中学生，保安人）。

我们让马宜超把介绍信缝在衣服里带着。护照就利用了曹、马二人从榆林到西安的护照（将二人改为四人）。我们商定，如果路上遇到盘问，就说是去西安考学没考上，又改去兰州的。

2 月上旬，我们由西安出发，经淳化、土桥到井村，由秘密联络站的同志转送到陕甘边苏区陕甘特委所在地薛家寨（寨子下边就是照金村），整整走了三天。我们到时，正遇刘志丹同志率红 26 军主力回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志丹同志。他当时刚 30 岁，体格清瘦，说话沉稳、和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住了三天，就编入部队行动了。

曹士荣和马宜超编在步兵连，我和马德林编在骑兵连。我在第一班，班长贺耀华，副班长李耀华。

贺耀华班长是我的延长老乡。他非常勇敢，对我关怀备至。1927 年在延长县第一高小读书时，我与他是同班同学，同时入的团；1930 年在宜川后九天杨庚五匪部搞兵运时，我们也同在一起（我在四营，他在大刀队）。现在，我们又同在刘志丹的红 26 军，而且还在同一连、同一班，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可惜，他后来在终南山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在贺耀华等同志手把手的帮助下，从没当过兵的我，苦练骑马，苦练刀法，苦练射击，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术，能骑善砍，打得一手好拼抢，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战士。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跟着部队在苏区外围进行了几个月的游击作战。参加了金锁关围歼战、咸榆公路伏击战、西凤山公路遭遇战、西峰镇阻击战、段家堡歼灭战等大小十余次战斗。实战的锻炼，使我愈加成熟。

1933年5月，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兼红26军政委的杜衡，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刘志丹等同志反对，强令红26军（红2团）到秦岭一带开辟新区。

红26军说是一个军，其实只有一个红2团，不到一千人。代政委汪锋（政委杜衡借口回省委汇报工作，未随队南下，回去后不久即被捕叛变），团长王世泰，刘志丹当时被贬为参谋长（但我们仍习惯地称他为军长或总指挥）。下辖骑兵、步兵、青年三个连。骑兵连长杨棋，政指惠志红；步兵连长吴岱锋，政指高锦纯；青年连长赵启民，政指杨文谟。

5月下旬，红26军（红2团）主力被迫离开照金根据地，冒险南下。

行至淳化县时，遇敌阻截。我军步骑协同，一个冲锋就将敌人冲垮，全部压到沟底。我和战友们跃马挥刀，在敌群中往来冲杀。我一连砍杀了三个敌人，收刀入鞘，双腿夹马，直立在马镫上，用准确的拼抢向逃敌射击……忽然，我的枪卡了壳。我急忙下马，用枪条去捅。这时，一颗流弹从我手臂划过，犁下一道沟，鲜血直流。“操你妈！”我怒骂着，翻身上马，挥刀朝敌人密集处冲去……

在这场战斗中，贺耀华班长身先士卒，杀敌英勇，缴枪最多。

战斗胜利结束后，我军没有停顿，由我们骑兵连一班高举着军旗在前面领军，用急行军的速度，继续向着终南山方向疾进。

## 血战终南山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杜衡的出卖，红26军（红2团）南下终南山陷入绝境。谭生彬等同志完成掩护任务后，跟随刘志丹突围，被敌打散。在群众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这是红26军军史上最惨烈的一页。

—— 编者

我红26军（红2团）在淳化突破敌人堵截后，以骑兵连为前导，一路南进，经富平、三原武字区、高陵城下，涉过渭河，经过距西安二十里的灞桥，插向临潼上塬，进至终南山脚下。部队沿山脚向东疾进，于6月初在渭华高塘塬一带进山。

终南山是陕西一座有名的大山，位于西安市南边约百里处。峰峦叠嶂，峭石陡壁，沟壑险峻，草深林密，属于秦岭山脉的一部分。

当时，我和绝大多数基层指战员一样，都没有想到此时我们已被杜衡出卖，送入绝境。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陕西省委当时对杜衡的做法是反对的。部队离开照金后，省委曾指示沿途党组织设法拦住红26军，阻其南下。无奈部队行动太快，等三原、高陵等地方党组织接到省委指示时，我军已渡过渭河，无法追上，痛失了避免惨败的最后机会。

我军过灞桥的当天，就被敌人发现。敌杨虎城部第二天派出几个旅的兵力分路跟踪追击。部队进山后的当晚在张家坪宿营，第二天拂晓便陷入敌一个旅的重围。凌晨突然爆发出的枪声、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撼着山谷，形成巨大的回声，震耳欲聋。我们未及吃饭，冒着大雾，仓促应战。敌人仗着人多，硬将我军冲垮，各连建制全被打乱。骑兵连奉命就地阻击敌人，掩护全军分三路突围（刘志丹、江锋、王世泰各带一股）。

骑兵连抢占了村后一个小高地，顽强阻击着疯狂扑来的敌人。但是，我们的

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敌人七、八挺重机枪疯狂地咆哮着，密集的机枪子弹把一片片碗口粗的杂木林拦腰斩断，阵地上战友一个又一个中弹倒在血泊中。不到半个时辰，骑兵连已经伤亡大半。就在这时，班长贺耀华同志中弹了，我猛扑过去抱起他，只见他前胸三处酒盅般大的重机枪弹洞在向外喷涌着鲜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右臂指向刘志丹突围的方向，急促地说：“快！快！跟着……跟着……”话没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我明白，班长是催我赶快跟着刘志丹突围！看着战友一个个牺牲，我心如刀绞！在打退了敌人又一次冲锋后，我们剩下的二十几个同志翻身上马，分别向部队不同的突围方向追去。

我和几个同志追上了刘志丹率领的那股突围部队。刘志丹看到我们归队，高兴地赶过来与我们握手。这时有的同志像儿子见了失散重逢的母亲一样失声痛哭。我此时心中只有复仇的怒火在燃烧：“复仇！复仇！为牺牲的战友复仇！为贺耀华班长复仇！”刘志丹看见我们悲愤的神情，忽然跳上山岩，高声喊道：“同志们！这次我们南下作战吃了大亏。现在部队已经被敌人打散了，我们的处境十分危急。但红军是消灭不了的，红 26 军的红旗永远不会倒！大家绝不要悲观，也不能与敌人硬拼。从现在起，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千方百计突出敌人的包围！”这时，他用手中的驳壳枪指向北方，激昂地说：“同志们！向北突围，回陕北去，回照金去！保留革命的火种，工农革命一定胜利！”听了刘志丹的话，陷入绝境的我们，真像在茫茫大海中看见了指航的灯塔，在绵绵的大山中找到了出山的坦途。已经疲惫到极点的战士们，这时都跃然而起——跟着刘志丹，突围！

此时的终南山，满山是狂喊“活捉刘景桂”的敌兵。出山的道路全被封锁。一股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踪，胡乱开着枪，远远地围了上来。我和战友们不时回头还击。刘志丹朝我们喊道：“同志们，不要恋战，甩掉敌人，隐蔽突围！”率队钻进一片梢林，直向山后插去。

我们这股队伍大约有一百多人，三个连的战士都有。指挥员中除了总指挥刘志丹，还有步兵连连长吴岱锋。大山里乱石交错，路险难行。往日纵横驰骋的战马，此时反成了突围的累赘。刘志丹见状，果断命令弃马，并亲手开枪打死了自己心爱的坐骑。我们含着眼泪丢掉了自己的战马，跟着刘志丹在大山中与敌人周旋。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队伍运动到一个小村附近。刘志丹同志一面命令疲惫不

堪的部队隐蔽休息，一面派出尖兵进村侦察，想进村找点饭吃。不一会儿，尖兵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村里有敌……”话音未落，就见村里冲出一股敌人，机枪子弹“哗哗”地扫了过来。“军长，快走！”我和战友们拼死抵抗。怎奈敌人太多，队伍很快就被打散。我这一股有王兆相（刘志丹警卫队长）、康健民（司号员）等二十多人，摆脱敌人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失去了联系。离开了刘志丹同志的亲自指挥，大家心里都感到空荡荡的，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互相鼓励着，牢记刘志丹同志“回陕北去，回照金去”的指示，继续向着山外前进。

第二天，又是中午。我们刚从山梁下到一条沟里，又与一股敌军遭遇。敌欺我人少，嘴里狂喊着“抓活的”、“缴枪不杀”，一窝蜂地拥了上来。抵抗已毫无意义，二十几人四散奔逃，第三次被敌人冲散。我一口气窜上山顶，钻进梢林。环顾左右，身边只剩下王兆相同志一个人。

我和王兆相紧握着枪，隐藏在山林里，注视着漫山遍野搜山的敌人，心中想的还是刘志丹那句话：“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千方百计突围出去！”敌人喊叫着，胡乱地开着枪，折腾了几个钟头，一无所获，天黑时收兵回村了。

初夏的终南山，寒气依然逼人。我们互相依偎着，在山林中躲了一夜。山林寂静，繁星闪烁。两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被一种崇高的信念鼓舞着，竟没有多少惧怕。

第二天一早，我俩喝了几口泉水，吃了几棵野果，勒紧裤带，一口气翻过两道山梁，终于进入了出终南山的沟道。

我们走到离出山口十余里的地方，决定把枪毁掉。我们先把枪栓抽掉，再把枪用石头砸坏，把分解后的零件连同子弹扔进深草中。

太阳落山后，我俩开始出山。王兆相在前，我在后。刚走出山口，就听到西边山根下传来敌哨兵狼嚎般地呐喊：“啥人？站住！”随着，两声凄厉的枪声震破夜空。“快跑！”王兆相压低嗓门朝我喊了一声，便向西南方的山根下跑去；我转身跳进了东北方向的一道水渠……（从此我俩不知彼此下落，直到1938年在延安开会时才相见重逢。我们这对经过终南山炮火洗礼，患难与共、破枪突围的老战友，重逢时双手紧握，久久不愿松开。那种战友的生死之情，是常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这是后话。）

山口处，人声嘈杂。一群敌兵叫骂着，晃动着手电，朝我藏身的地方走来。这时，老天仿佛有意掩护我。半空响起一声炸雷，一道闪电劈向山口，倾盆大雨

铺天盖地而来，敌人一下子没了动静。我悄悄摸进一个村子，被一个老乡藏在麦草垛里，躲过敌人的搜查。

第二天，女主人给我找来一顶破草帽，又拿来一双蓝布鞋让我穿上，还让他丈夫给我剃了头，简单化了装，然后把我送出了村。

我一口气跑上村外的一座小山，回身眺望着仍被浓雾笼罩的终南山，惦念着志丹同志的安危，惦念着所有被冲散的战友的安危，惦念着与我一同破枪出山的王兆相同志的安危，迈着坚定执着的脚步，向着陕北的方向走去……



# 战士有泪不轻弹

——终南山突围中的几个小故事

在终南山突围的过程中，横刀跃马，血溅征衣，  
从没眨过眼的谭生彬同志三次流下了眼泪……

—— 编者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没到伤心处”。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条汉子。横刀跃马，血溅征衣，从来没有眨过眼。可是，在终南山突围的过程中，我竟然三次流下了眼泪——

## 一、弃 马

部队在张家坪被敌人打散后，我们骑兵连部分同志跟随刘志丹率领的一路，甩脱敌人，向着蓝田方向突围。

终南山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走都很困难，马走更成问题。我们带着 20 多匹战马，行军速度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志丹同志果断命令弃马。为了不让战马落到敌人手里，队伍里七零八落地响起了杀马的枪声。接到这个命令，我惊呆了！战马是骑兵的第二生命，是骑兵的亲人。我的这匹枣红马，驮着我，冒着枪林弹雨，参加过许多战斗，杀死过许多敌人，和我相依为命，是有功的……现在让我丢掉它，杀死它，我怎么下得了手？！“小谭，还楞着干什么？执行命令，跟上队伍！”杨琪同志远远地朝我喊道。“噢——”我嘴里答应着，还是没有动手。我一手拉着缰绳，一手轻轻梳理着马脖子上的鬃毛。也许是其它马儿的哀鸣引起了它的警觉。它支楞着耳朵，静静地、信任地看着我，眼角似乎泛起了泪水。我不敢和它对视。“绝不能杀它！”我暗暗对自己说。环顾四周，左边有一片梢林。我拉着枣红马，走进梢林深处，趁它不注意，丢下它，悄悄转身溜了出来，追上了部队。

这时，远处响起枪声，敌人又撵了上来。

没有了马匹拖累，队伍的行军速度加快了许多。突然，背后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我们大惊，以为敌人追上来了，急忙卧倒，准备迎战。定眼望去，原来是我军的一匹战马跟踪而至。我一眼认出，正是我刚刚丢弃的枣红马！“枣红马呀枣红马，你怎么跟上来啦？！”我心里暗暗叫苦。枣红马恋主，紧随部队，你走它走，你停它停，不肯离去。我急得两眼冒火，双脚直跳，为防暴露目标，引来敌军，几次含泪举枪，终不忍下手。最后，几经周折，才将其甩掉。望着向相反方向追去的枣红马，听着马儿那一声声令人心碎的嘶鸣，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 二、破枪

第二次流泪，是在我和王兆相破枪的时候。

我和王兆相在与刘志丹和其他同志失去联系的几天后，摸到离出山口十里远的一个山沟里。稍事休息，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为了便于隐蔽出山，更为了不让革命的武器落到敌人的手里，我俩决定破枪。

“破枪——”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我这支“湖北造”，刚入伍时就跟着我。虽说枪口已经磨圆，但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倒在她枪口下的敌人却不止一个。王兆相的那支“老套筒”，更是老的出奇。枪身上的烤漆都没了，他却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宝贝疙瘩。我仔细端详着自己的那支“湖北造”，用手轻轻为她拂去粘在枪把上的一块泥土；王兆相把“老套筒”抱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就像母亲在抚摸自己的孩子……

“破枪”的决定作出老半天，谁也没有行动。忽然，我心里闪过一个想法，兴冲冲地对王兆相说：“老王，干脆咱们别砸了，就埋在这儿算了！”“埋你个毬！”王兆相恶狠狠地朝我吼道：“埋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来取？！砸！决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王兆相是刘志丹的警卫队长，神木人。我俩很对脾气，关系不错。我知道他不是有意骂我——他心里也不愿意破枪，有气没处撒，借题发挥，拿我当出气筒。这时，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远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雷声，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俩就这样又坐了一袋烟工夫，不约而同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站起身，把枪高高举过头顶，狠狠地向石头上砸去……随后，又将卸下的枪栓和仅剩的两排子弹，远远地抛进了梢林。

望着砸烂的枪枝，我俩在寒风中呆呆地站立了许久，悲怆冷峻的脸上，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 三、遇救

我俩趁着黑夜，刚走出山口，就被敌哨兵发觉冲散。多亏大雨从天而降，让我们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我爬出藏身的水渠，四处望了望，看不到王兆相同志的踪影。便一个人冒雨摸到离进山口二里路的一个小村里。村口没有发现敌人的哨兵。崖畔下有户人家，没有院墙，没有大门，只有两面破窑洞。“肯定是穷人！”我心里说。东窑的窗口透着灯光。我摸过去，轻轻地敲了敲门。“谁呀？”窑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刘景桂的兵！”门轻轻地开了一道缝，一只大手一把把我拉了进去。这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人。男人的婆姨迎了上来，炕上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好兄弟哩，刚才的枪是不是打你？这村里满是白军，你到处乱跑，不要命了？！”说着，递给我一件干衣服，把我藏进西窑的麦草堆里。

大雨在后半夜停了。天刚麻麻亮，村里就响起白军的集合号声。不一会儿，东窑的门开了，只听婆姨轻轻地对男人说：“娃他爸，快出去看看！”约有一袋烟的功夫，男人跑了回来，打开西窑门，冲着麦草堆喊道：“兄弟，白军都进山了！”我一听，“呼”地一下就从麦草堆里跳了出来，顾不得拂去满头的麦草，冲着俩位救命恩人，拱手说道：“大哥、大嫂，谢谢你们！我走了！”婆姨一把拉住我，说：“你这个样子出去，就不怕遇上白军？让娃他爸给你剃个光头，吃完饭再走！”

饭后，婆姨找了一顶破草帽给我戴上；又找出一双蓝布鞋，一针一针地钉好鞋带，双手递给我，对我说：“兄弟，路还远哩！你脚上的鞋烂得不能了，快把这双鞋换上！”她看着我穿好鞋，亲手给我系好鞋带，转身从锅里拿出两个馒头，硬让我带上。最后，又对男人安顿道：“娃他爸，你再给他找一把锄头带上，看着把他送出村。遇上白军盘问，就说是咱家雇的受苦的……”望着这一对朴实憨厚，为救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红军战士忙得团团转的农家夫妇，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呜咽着，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婆姨笑了，拉着我的手说：“好兄弟，不要说谢，再说谢就见外了！你们红军流血打仗又是为了谁？我们山里人，没念过书，没见过世面，可我们知道，谁为我们谁就是好人！谁对我们好，我们就拥护谁，就跟谁走……”停了一下又接

着说道：“刘景桂是好人，你们红军都是好人！前几天，你们进山路过我们村，还给我们分过地主的粮食哩！”说着，婆姨的眼圈也红了。“渭华暴动那会儿，我们就知道刘景桂……这么好的队伍，咋才这么几天，就又……”

“大嫂，你放心，”我忍不住打断了婆姨的话：“我们这次是叫白军打败了，可是我们有共产党领导，有老百姓支持，最后我们一定能胜！白军嚣张不了几天，红军很快就会回来的，刘景桂很快就会回来的……咱们穷人一定能过上好光景！”我连珠炮似的，越说越上劲。听了我的话，婆姨苦笑着点了点头，和丈夫对望了一眼，许久没有再说一句话……

男人一直把我送到村外。

一九五零年我到西安工作后，曾去寻找过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但没有找到……他们的样子，那时的情景，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 回陕北去

“回照金去！回陕北去！保留下革命的火种！工农革命一定会胜利！”——谭生彬同志牢记刘志丹的召唤，怀着崇高的信念，跋山涉水，揽工讨饭，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延长，与从陕甘特委回县的刘维丹、黑志德接上关系，成立了中共南区委员会。革命火种又在阿青塬、皇庆寺塬燃烧起来。

—— 编者

部队在终南山被敌人打散后，我和王兆相与刘志丹等同志失去了联系。

七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俩在夜幕掩护下向山口外摸去。不想，刚出山口，就被敌人的哨兵发现，只好各跑各的，自行突围……在一家贫苦农民夫妇的掩护下，我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了这对夫妇，踏上了回陕北的路程。

我从终南山口的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出发，由西向东，当天就走了一百多里，在下午太阳快落山时赶到了赤水镇。坐船过河后，再由南向北，朝着陕北的方向走去。一路上，跋山涉水，揽工讨饭，历尽千辛万苦。途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没有动摇回陕北的决心。我牢记着刘志丹同志的话：“回照金去！回陕北去！保留下革命的火种！工农革命一定会胜利！”

由于在路上经常讨不到饭吃，我在白水县的一个村子里（村名忘了）揽了五、六天工，帮主人做农活并帮着记账。村里人发现我很能干并且有文化，极力挽留我，请我在他们村里的小学教书。这对于当时饥困交迫、沿途乞讨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诱惑！但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无数牺牲战友的仇还没有报，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怎能逗留此地，苟且偷生，将革命半途而废？！我赚了几个路费钱后，就继续赶路了，一天都没有多停留。

走到宜郡时，我在白水揽工挣的那几个钱早已花光。饥肠辘辘，浑身无力。如果不是手里有根打狗棍撑着，早就躺倒了。我迈着蹒跚的脚步，走进了一个名

叫口家河的小村。我走到一户人家的门口，拍了拍门，有气无力地叫道：“掌柜的，行行好，打发一点……”门开了，出来一位五、六十岁、面目和善的老汉。他给我倒了点稀饭，塞给我半块玉米糰子，问我是哪里人，为什么流落此地，最后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家打几天零工？我正求之不得，就痛快地答应下来。我干活勤快，从不偷懒。起圈，垒粪……样样农活都干得漂亮。尤其是锄地，三锄下去，土松草净，禾苗无伤，又快又好。老汉高兴得到处给人说他找了个好受苦的。他想让我多干些时日，我谢绝了。

经过甘泉附近时，我一个人一座大山里整整走了一天。记得那山里有一条羊肠小道，小道两旁是齐人高的深草。我独自一人在这条小道上行走如飞。此时，如果跳出几个劫道杀人的土匪，我恐怕早就死在这荒山野岭中了。尽管如此，我心里却没有一点害怕之意。当晚，我就歇在山上的一座破山神庙里。深山古庙，月黑风高。我脱下鞋当枕头，在庙里那尊泥塑的、残破不全的山神爷陪伴下，躺在满是灰尘的供桌上呼呼大睡。几十年后，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也不由不惊叹人的精神的巨大力量！

就这样，我七月初离开终南山口的那个村子，经过渭南、蒲城、白水、宜郡、中部、洛川、郃县、甘泉，辗转千里，走了整整一个月（包括揽工的那十几天），于八月初回到延长。

那是八月初的一个早上，公鸡还在打着鸣，天刚刚放亮。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进村里。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终南山口那位救我的婆姨送给我的兰布鞋早已磨烂，趿拉在脚上。我拄着打狗棍，一步一步挪到了下硷，挪到了离自家窑洞不远的地方。小路口上的那个碾盘还在。我一屁股坐在碾盘上，抬头仰望着苍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时，西窑的门开了，白牛婆姨（我侄媳妇。白牛，官名谭永明，我长兄之子，共产党员）端着一筐箩玉米向着碾盘走来。“三大，真的是你？！”她看到我，惊讶地大叫起来。手一松，筐箩掉在地上，玉米撒了一地。“怎么，不像？”我苦笑着说。“像！像！——像个要饭的！”她转过身子，朝着窑洞大喊：“娘——！白牛——！你们快出来看呀，我三大回来了！”听着亲人这忘情地呐喊，我心里热呼呼的。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真的到家了！

回到村里后，我小歇了几天，缓了口气。随即和原阿青塬支部的肖彩丰、李学白、肖佐汉、谭生福、谭生祥、谭永昶等同志，原皇庆寺塬支部的李春光、高

永光（又名高朗亭）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向我介绍了延长党组织和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我也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参加红 26 军及终南山突围的经过……大家互相鼓励着，坚定了“即便失去上级领导，也要继续坚持斗争”的信心。

面对当时延长党组织濒临瘫痪的困难局面，我在阿青村以教书为掩护，串联党内同志，宣传群众，鼓吹革命，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是年末（好像是十一月上旬），刘维丹、黑志德同志从陕甘特委回到县上。我与他们接上了关系，成立了中共南区委员会（我任区委委员）。革命的火种又在阿青塬、皇庆寺塬熊熊地燃烧起来……

## 志丹同志让我留在地方

谭生彬等同志积极配合刘志丹、高岗率红 26 军、红 27 军解放延长。考虑到建设延长红色政权的需要，刘志丹拒绝了谭生彬重返部队的要求，要他留延长工作。他先后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第一任县长，成为延长县历史上第一位红色行政首脑。

—— 编者

1933 年 8 月初，我从终南山突围回到村里后，于同年 11 月上旬，和陕甘特委派回延长工作的刘维舟、黑志德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成立了中共南区委员会，我任委员。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志丹同志已安全返回照金，红 26 军也已恢复，高兴得几天都没睡好觉，好几次梦见自己横刀跃马，又回到了部队。

中共南区委员会成立后，延长南区党的工作日显生气。阿青塬支部、皇庆寺支部的活动十分活跃。尽管在后来的时间里，延长党组织和上级的联系一直没能恢复，南区委也同陕甘特委失去了联系，但我们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 1935 年 4 月开始，我带领阿青塬、皇庆寺塬两个支部的同志，一改先前偃旗息鼓的秘密活动，开始了全县范围内的农村大串联，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我们还派李春光同志同延水县的一个区委取得了联系，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和经验（如组织贫农团等）。

——是年 5 月，延长人民终于盼到了解放的一天。

解放延长，是志丹同志创建陕北苏区战略计划的重要一环，是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第二次围剿的重要一战。

5 月 26 日，志丹同志（前敌总指挥）和高岗（前敌总政委）率红 26 军、红 27 军主力秘密运动至延长交口一线，对外封锁消息，伺机攻城。

5 月 27 日，我军根据延长党组织情报，为削弱敌城防力量，先以红 27 军一



个连，在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配合下，设计将守城民团百余人诱至距城百里之如子腰，死死缠住。然后，由志丹同志和高岗亲率红军主力直插延长城下，于5月28日佛晓，乘敌不备，发起攻击。我攻城之红26军、红27军各一部，在义勇军配合下，架设云梯，分别从城西北角、东北角及城北突入城内。经三小时激战，以伤亡十余人的代价，全歼敌延长驻军84师直属骑兵连及民团、矿警四百余人，生俘该连连长和县长董公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马匹、银元、辎重，一举解放了延长县城。

此时，被我缠阻在城外百里之民团方知中计，急夺路回窜。我军前堵后追，将其围歼于烟雾沟。团总李铭武（大革命时曾是我党党员，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脱离我党）拒不投降，被当场击毙。

延长解放后，欢呼雀跃的群众把集中在城里的豪绅、地主、反动分子都扭送到红军总指挥部管押起来。各店铺的红布全被买光。除制作红旗外，所有群众都将其裁成布条缠在左臂，表示自己红了！延长红了！革命胜利了！

延长的解放，吓坏了周边各县的敌人：延川县城和永坪镇的敌人弃城逃往清涧县城，甘谷驿镇敌保安团一部自动向我缴械投诚，延安县的敌人紧闭城门轻易不敢外出……几个县的广大农村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

红军攻城前，我们在农村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阿青塬党支部在支书肖彩峰带领下，组织几百农民为红军送粮送水，场面热烈感人。

延长解放的第二天（5月29日），我们又组织大批农民进城，迎接红军，庆祝解放。我归队心切，进城后的当天下午，就直奔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找志丹同志汇报请示工作。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伪县政府院内。我走进窑里，看到志丹同志正在和高岗（前敌总政委）、杨琪（前敌副总指挥）研究明天军民大会的议程，参加会议的还有董耀卿同志。我抢前几步，“啪”的一个立正，挺胸收腹，向志丹同志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总指挥，骑兵连一班战士谭生彬前来报到！”志丹同志先是一愣，接着就伸出双手惊喜地叫道：“是你？！早听说你出山后又回延长搞起了地下工作，今天总算见面了！”我紧紧握住志丹同志的大手，使劲摇晃着，泪水模糊了眼睛。志丹同志摆了一下手，对在会的同志说：“你们先研究，我和老谭（志丹同志虽长我十岁，但从不摆架子，在部队时就这样叫我）出去一下，有话要说！”

我和志丹同志在院子里边踱边聊，谈了约个把钟头。他向我详细了解了地方上的一些情况，我也向他询问了部队上的一些情况。最后，我向他提出了回部队的要求。志丹同志略微思考了一下，笑着对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本来就是咱红 26 军的人嘛！只是延长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你是本地人，情况熟悉，我个人认为你留在地方比回部队作用更大。”停了一下又说：“这事你也别太急。到底怎么办，等我们和西北工委商量后，由高岗总政委告诉你。”离开志丹同志，我又回到前指的窑里。高岗、杨琪和董耀卿同志正在研究一份《反动豪绅地主名单》。见我进来，大家抱在一起，又是一阵惊喜的欢笑和寒暄，格外亲切。

5 月 30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庆祝红二十六、七军伟大胜利和纪念五卅惨案大会”为会标，在延长召开了一个上万人的军民大会。志丹同志、高岗、朱镜清（第一高小校长）、李志公（第一女子高小校长）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结束时，由高岗当众宣判，当场处决了国民党反动县长董公绥和延长头号反动豪绅刘向臣。

6 月 1 日，志丹同志率红军离开延长，开往甘泉。留下高岗带一批政工干部帮助延长、红宜、延川等县整顿地方工作。出发前，前敌总指挥部将群众捕送来的那批地主豪绅和反革命分子又处决了几个，剩下的全部移送到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由省府保卫机关审查处理。

我望着浩浩荡荡开走的红军队伍，想到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部队开走的当天下午，高岗通知我和董耀卿召集一些地方党员开会。会议由前指政治部干部小董主持。

会议开始后，高岗见大家有些拘谨，便笑着说：“生彬同志和耀卿同志我早就认识，其它同志还都是头一次见面。咱们先自报家门，来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看到高岗态度平和，没有架子，心情都放松了许多。

“同志们——”高岗随后说：“这些年来，延长党的同志，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为我军这次解放延长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西北工委和前委对延长党的工作是肯定的！”听他这番话，大家心里都特别感动。高岗挥了挥手，继续说道：“这次延长的解放，意义十分重大。它加速了苏区版图的扩大，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唤起了广大的民众。当前，为巩固和发展延长新区，前委和西北工委要求我们，下一步必须完成这样几个任务：

第一、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第二、组织赤卫军、少先队，把群众武装起来；第三、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会后大家马上下去，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为落实这三项任务，会上当场成立了几个工作队：我和李春光、高永光、肖彩峰、肖佐汉、冯瑞珍去南区；董耀卿和小董去中区；李志钦和高岗去西区；黑志德、赵正化回红宜县。

散会后，高岗对我说：“生彬同志，志丹同志让我正式通知你，考虑到巩固和发展地方政权的需要，经前委和西北工委研究，决定你还是留地方工作——”看到我失落、沮丧的样子，高岗笑了。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严肃地说：“小谭，老刘就怕你想不开，所以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向你讲清这个道理。你是党员，做事情、想问题要顾全大局，要服从组织的决定！”我无话可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们这个工作队在南区大约工作了半个多月。依靠骨干，深入群众，搞得如火如荼。其间的一天，高岗由西区转经县城去红宜县路过阿青塬，正值我主持召开南区赤卫军成立大会。高岗很高兴，上台讲了话，群众情绪十分振奋。在这次会上，我们抓捕了几个坏人，并当场宣布对其处以极刑。国民党保安团队长李启明、哥老会头子雷振江由赤卫队员执行；高岗拔枪，亲自处决了老曹和白老三（均为哥老会头子）。

6月下旬，延长县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经前委和西北工委决定，由我担任主席。我当时对政权建设没有一点经验，压力很大，便向高岗提出：“可否暂由王士俊同志（革委会副主席，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派来的）和白如冰同志（工委书记，西北工委派来的）代为主持革委会工作，让我先到省府办的干部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高岗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月底高岗返部队时，我便随他一同来到瓦窑堡。

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同志不同意我这样做。他找我谈话，对我说：“生彬同志，你要求学习的想法是好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工作千头万绪还没有走上轨道，派去的那些干部对当地的情况也不熟悉，你说你压力大，他们压力比你更大！你必须马上回县主持工作，把主席的担子挑起来！”霍维德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在瓦窑堡只住了一天。回到县里，我和白如冰、王士俊等县党政领导同志，振奋精神，团结协作，学中干，干中学，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进入了状态。我们

完善了各级职能部门，由上而下成立了区、乡两级革命委员会，为我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接着，我们又通过由下而上的选举，先在各乡、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选出了各区参加县苏维埃政府选举的代表。1935年8月，延长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选举产生了县苏维埃政府，我当选为主席。

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我兼主任），和县委一起，以“扩大红军”和“土改分地”为中心，带领广大党政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为巩固和发展延长苏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延长各级（乡、区、县）苏维埃政府健全巩固了；各级党、团组织建立了；各级赤卫军大队（连）建立了；各级工会和农会建立了。广大农民分得了日思夜盼的土地，结束了束缚自己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无不称颂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大恩大德，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妇女工作、少先队工作也都开展得有声有色，虎虎生气。“扩红”、“支前”、“征粮”等许多工作多次受到陕北省委和省府的表扬……整个延长，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县份、东南门户和抗日前哨。

1937年10月，延长县召开第一次参议会，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我当选为第一任县长。1940年10月，我调延安工作时，延长各界群众还曾联名上折予以挽留。所有这些，都是党和群众对我在延长工作的最好评价和肯定。

地方工作的生动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地方工作在整个革命链条中的重要性。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地方领导班子，建立一个扎实稳固的地方红色政权，切实保障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充分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琐碎然而合理的要求，想民想，急民急，谋民需，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人民群众源自内心的真诚支持，就一定能够带领他们排除万难，取得革命的最后的胜利。

光阴似箭。现在，每当我忆起这段历史，都会万般感慨，倍感志丹同志当年留我在地方工作的正确。我感谢志丹同志为我创造了这样一次在地方工作的机会，它让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受益无穷。志丹同志的高瞻远瞩，知人善任和全局观念，让我钦佩，让我折服。

尽管如此，在我内心深处，却至今仍然留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遗憾，那就是没能重回红26军，没能继续当红26军的一名战士。我深爱着红26军。当一名红26军战士，是我一生的最大骄傲和光荣！

## 附录：

# 谭生彬大事年表

(1912—1980)

**1912年（民国元年）5月18日** 出生在陕西省延长县安沟乡阿青村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名生彬，字志博。爷爷谭万玉、父亲谭正芳、母亲肖氏。

**1926年上半年** 在延长县第一高级小学（简称一高）读书时参加革命。他经常参加校内的各种学习辩论会和体育活动，追求真理，抨击时弊，强健身体；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上街演节目，喊口号，散传单，宣传革命；经常和师生一起，下乡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剪发放足、反剥削、反压迫、平等自由等革命道理，帮助组织农会，鼓励他们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其间，在校长朱幼康带领下，全校师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1927年4月** 退出国民党。经董耀卿、胡金城同志介绍，在一高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共产党的活动之中，年仅15岁。

**1928年11月** 在延长县第一高小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转党后，任共青团延长特区委员会书记、中共延长特区委员会委员，同时以书记员身份打入县教育局任职，配合董耀卿同志（时任县教育局局长），把教育局的领导权紧紧抓在我党手里，为我党工作在一高等学校的顺利开展，撑起了有力的保护伞。

在他的领导下，延长团的工作十分活跃……或向青年学生宣灌革命真理，或组织他们上街示威游行，或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截至1929年底，全县团员发展总数将近100人。

**1929年春** 积极组织、参加和领导了延长县的两次反饥饿斗争。一次是领导二区党支部在二区发动的，参加斗争的饥民大约有100多人。另一次是由党区委直接领导发动的。愤怒的饥民进城包围县府，要求发放救济粮。与前来驱散的警察发生了搏斗。反动政府迫于压力，为息民愤，被迫给饥民发放了一些救济粮。斗争取得了胜利，群众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

**1929年10月** 延长党组织与陕北特委联系完全中断。在延长党的工作失去上级领导，从区委到支部，党、团工作全部处于停顿状态的情况下，他仍坚持

活动，深入农村，协助农村党支部（特别是南区党支部）开展了一些工作，发展了一些党员。但是，这些工作都无助于当时整个“停顿”局面的改变。

**1929年12月** 为了找到上级党组织，使延长党的工作尽快恢复正常，他辞去县教育局工作，回到乡下家中，准备到后九天土匪杨庚五部寻找上级党的关系。

**1930年2月** 他趁土匪进村绑票之机，将计就计，打入杨庚五部，与赵文蔚、刘子善三人组成中共杨庚五部特别支部，领导我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其间，高岗从延安来后九天检查指导兵运工作，在山上住了十几天。

**1930年6月** 后九天兵运失败，杨庚五部被国民党高双成部强行改编。他同赵文蔚、刘子善失散，再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这是他第二次失掉党的关系。

**1930年8月** 他从阿青返回延长。这时，李之钦（又名李志清，共产党员）从绥德师范毕业，回一高任教。带回了陕北特委的指示，对一高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重建了一高党支部，延长党的工作有所恢复。经组织安排，他深入农村，先后到皇庆寺小学、董家牙塬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串联各村现存党支部中的一些同志，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宣传群众，宣传革命，积蓄力量。

**1931年7月** 延长党组织又一次与陕北特委失去联系，工作再度陷于停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5年5月延长解放）。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消极等待，坚持“各自为战”，联系部分党员同志，继续在延长城乡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2年5月** 组织、发动和直接领导了延长县数万农民包围县城的抗粮抗款斗争，围城10天，取得了缓缴粮款的重大胜利。

**1932年6月下旬** 为躲避国民党反动县政府的通缉，逃离延长奔赴西安。

**1932年8月至1933年2月** 通过康寿山同志在省立第一师范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西安地区搞了几个月的地下工作。

**1933年2月** 同马德林、马宜超、曹士荣等三人持陕西省委给陕甘特委的介绍信，赶往照金，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红二团），任骑兵连一班战士，第一次见到并认识了刘志丹同志。参加了金锁关围歼战、西峰镇阻击战等大小战斗十余次。

**1933年5月下旬** 红26军（红二团）南下终南山。部队被打散后，他与王兆相破枪突围，经群众掩护，躲过敌人搜捕，辗转千里，讨饭回到延长，暗地串联周边各村党员，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1933年11月上旬** 与从陕甘特委回县的刘维丹、黑志德同志接上关系，成



立了中共南区委员会，革命火种在阿青塬、皇庆寺塬熊熊燃烧起来。

**1934年12月** 打入某“哥老会”组织，利用“哥老会”的保护色，获取情报，开展党的工作；并启发、争取其会众对党、对革命的认识、同情和支持。

**1935年5月28日至30日** 积极配合刘志丹、高岗率红26军、红27军解放延长。攻城前，他领导农村党支部广泛发动群众，为红军传递情报，送粮送水；城开后，组织大批农民进城，迎接红军。庆祝解放。

**1935年6月下旬** 经前委和西北工委提名，当选为延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成为延长县历史上第一位红色行政首脑。

**1935年8月** 在延长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县委领导一起，带领广大党政干部，以“扩大红军”和“土改分地”为中心，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为巩固和发展延长苏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

**1936年初** 组织发动全县军民大力支援东征，成绩显著，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亲自批发他三号驳壳枪一支，以资鼓励；在石油厂宴请的餐桌上，毛主席指着他说：“我是大主席，你是小主席，你这个小主席搞得很不错嘛！”再次表扬肯定了他的工作。

**1936年6月至12月** 领导延长县军民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还乡团进行了七个月的游击战争。其胞兄谭生焜（时任安沟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和入党介绍人胡金城等被敌残酷杀害。

**1937年1月** 因“双十二事变”后的形势需要，他出任中共延长市委书记兼市抗日救国会主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暂由王子瑞副主席代理），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同国民党反动县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狠狠打击了它的嚣张气焰，使其人心尽失，威风扫地，政治上日益孤立。

**1937年7月** 延长县召开第一次参议会，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他当选为第一任县长。在担任县长的几年里，他和同志们一起，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巩固土改成果，向全县农民颁发《土地所有证》；经常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访贫问苦，征集民意；大力发展生产；积极兴办教育；扩红支前；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按时征收救国公粮，等等。整个延长，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东南门户和抗日前哨。

**1937年冬** 他和县委领导同河防司令员何长工一起研究，在离城10里的呼家川设伏，将从山西抗战前线畏敌逃跑、过河窜扰苏区的、当年杀害其胞兄谭生

煌的罪魁祸首李仙洲匪部百余人一举歼灭。李仙洲负隅顽抗，被我军当场击毙。

**1938年2月起** 在搞好政府工作、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为配合八路军警备五团固守延长河防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1月初** 领导延长军民全力支援警备五团作战，击退了日寇的进攻，粉碎了日寇妄图从我延长河防突破的企图，没让日寇踏上西岸半步。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 做为延长县代表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进行中的一天，轮他当执行主席。毛主席坐在主席台上，同他说了一会儿话，其中一句是：“豹子留皮人留名，这个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名。”这句话深深铭刻在他的心里。

**1940年10月** 离开战斗工作了十四年的延长，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在该局和边区其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1940年共征收救国公粮9万余石（占边区当年粮食总产量的6.4%），较好地保证了边区的粮食供应。

**1941年1月** 任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兼）。在边区政府的重视关怀和景范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他担任副主任的近两年时间里，边区抗动委从动员群众参军，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前，到组织自卫军、整顿少先队、组织缴纳救国公粮、开展社会教育和扫盲运动、组织普选、优抚抗日军属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2年10月** 任边区民政厅视察研究室主任。他上任后，立即调配人员，制定出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但还未及正式展开工作，该机构就又被撤销。

其间，他多次列席旁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边区参议会礼堂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西北局高干会”），受到很大教益，对极左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危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942年12月** 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先在一部，后到四部，最后又回到一部）。通过学习和整风，从路线高度对1933年夏红26军兵败终南山，1935年秋陕甘“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了更为清醒地认识，深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之大，深感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和必要性，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学习期间，他顺利通过了组织的严格审查。毕业离校时，一部二支为他做出了审查结论。结论说：“谭生彬同志历史清白，政治坚定，长于政权工作。在失掉上级领导期间，仍能主动坚持为党工作，应该计算党龄。其刚开始参加革命加

入共青团时的团龄，也应计算党龄……”这个结论，由一部二支书记何辉签名，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由党校组织处存档。

**1943年全年** 继续在中央党校学习。上半年主要是思想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整顿三风，党的历史，路线斗争；下半年主要是生产劳动和干部审查。

**1944年3月底** 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调任边区行政学院行政系副主任（主任由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同志兼任）。

**1944年4月1日** 与从延安西北党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李光宇结为伉俪，一起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路程，历尽风雨，不离不弃。

**1944年4月** 根据边区政府的决定，行政学院和延安大学合并，名称仍为延安大学。他仍任行政系副主任。

5月下旬，他在边区大礼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大合并后的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备受鼓舞。

**1944年11月** 调任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在延属分区工作期间，他和曹力如、李景膺等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经常深入基层，督导工作，认真履行边区政府赋予专署的权力，在宣贯边区政府政策法规；指导各县加强政权建设，抓好经济民生；发展地方武装，协助军队维持治安；解决辖区各县间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整个延属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间，他出席参加了西北局西北党史高干座谈会，并就1930年上半年我党在宜川后九天土匪杨庚五部搞兵运的情况作了发言。

**1945年初** 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认识了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此后的年月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习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习仲勋同志作为他的老首长、老领导，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在工作中都给了他许多指导和帮助。

**1945年4月至6月** 当选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9月** 第二次由地方调入军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党委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6年夏** 收到新十一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曹又参将军的入党申请书。又参将军是抗战胜利后较早率部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主席称赞他是推

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历史的火车头”。鉴于曹将军的特殊身份，他亲自组织了对其政治历史的审查，并亲自撰写了给中央的审查报告。

**1947年3月中旬** 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他奉命组织指挥联防军直属机关干部和家属撤退，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沉着镇定，克服千难万险，不丢一人一马，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途中，遇敌机轰炸，险些牺牲。

**1948年3月**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党委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8年8月** 同贺龙司令员和王维舟副司令员一起，介绍曹又参将军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2月**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党委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因工作需要，贺龙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又决定由他代理政治部工作，任西北军区政治部党委书记、代主任兼组织部长。

**1949年7月** 和同志们一起，协助贺龙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为《西北军区地方部队建军计划》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在贺龙、习仲勋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西北军区的部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部队不仅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都得到很大发展和提高，战斗力大大加强。

**1949年11月**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部党委书记、代主任兼组织部长。在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政治委员的领导下，他忠实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为搞好野战军与军区合并后的干部团结，更是相忍为党、舍私奉公。他平易近人、真诚待人、名利让人的工作作风，给接触过他的军队干部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建设和赢得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50年3月** 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由军队转入地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并主持两委日常工作。

在此期间，他又获多项任命：1950年4月7日，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1950年4月11日，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1952年8月7日，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26日，被任命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

12月9日，被任命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5月 出席了中央直属系统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聆听了中纪委第一书记朱德总司令的重要讲话。

1950年11月 亲自起草、修改和制定了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使西北局纪委的具体工作进入了有章可循的轨道。

1951年4月 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会议和全国第一次监察工作会议。

1952年7月 主持西北两委（纪委和监委）干部的评级工作，率先垂范，不争级却让级，把自己从6级降成8级，把爱人李光宇从14级降成16级。

1953年7月 父亲谭正芳在阿青去世，享年78岁。他携长子永泰驱车回乡奔丧，为父吊孝。

1954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布第一届国务院机构组建。他奉调进京，参加第一届国务院的组建工作。

1955年2月17日 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二监察司司长。

1955年7月18日 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助理（副部级）。

在长期的纪检监察工作中。他认真执行党的纪律检查和人民监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忠于职守，不徇私情，惩治了许多坏人，挽救了不少干部，为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国家的人民监察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6年1月25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

1957年冬 担任中央监察部二司司长期间，二司专员李建彤同志（刘景范同志夫人）应《工人出版社》约稿，找他请假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历史（原拟写自传，后改成小说）。他说：“写志丹同志革命历史是好事，我没意见。只是时间长了些，得和部领导打个招呼。”李建彤遂找人事副部长李景膺同志请假获准，开始了历时数年的艰苦笔耕。她四处奔波，六易其稿，终于于1962年写成了小说《刘志丹》。谁也没有想到，因为这本书，竟酿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令秦桧也要汗颜的现代文字狱。

1958年4月 中央监察部撤销。他调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先后分管财贸和文教等工作，不顾严重的心脏病，经常深入高寒牧区，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为早日改变青海省的落后面貌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1962年10月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因“习（仲勋）、贾（托夫）、刘（景

范)反党集团”案和“《刘志丹》反党小说”案,遭到政治迫害,作为重点对象,与朱侠夫等同志一起,在中共青海省委三届七次会议上被批斗围攻达40多天。

**1962年12月** 原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在将他打成“习仲勋反党分子”的企图未能得逞和未对他作出任何“反党”结论的情况下,宣布撤销了他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委职务。

**1963年1月** 被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期调中央党校学习的还有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名为学习,实为改造。其间,由党校组织,他和几百学员一起,到河南新乡专区七里营公社参加了七个月的四清,同那里的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5年10月** 党校毕业。因他在学习期间始终对青海问题持保留意见,被视为坚持错误,学得不好,下放燃化部锦西化工厂任副厂长。

**1965年10月15日** 赴锦西化工厂报到。为尽快熟悉该厂情况,进厂后先搞了几个月四清,1966年3月正式接手领导工作(分管人教)。他将自己的冤屈深深埋在心底,事事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爱戴和尊重。

**1966年6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再次遭到残酷批斗和迫害,在锦西化工厂的“牛棚”里被整整关押了3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家属也受到株连。

**1971年7月** 他从锦化“二总部”去西北局外调的造反派处,获悉了刘××背着中央撤销他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情况,十分震怒,当即写信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再次就当年的青海问题提出申诉。毛主席阅信后,亲笔批示中组部调查处理。

**1973年冬** 中组部干审局局长王硕代表中组部向他宣布了调查结论。王硕同志说:“你的撤销职务处分问题,是刘××私自篡改中央电报,假借中央名义下达的。中央调你到党校学习,没有给你处分,有电报可查。西北局书记处没有讨论过你的处分问题,都有人可证。现在已经查清,这个处分宣布无效。”历时数年,他在青海被撤职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1974年1月** 从锦化调回北京,就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李苏,原化工部副部长)。他十分珍惜重新获得的工作权利,全身心地投入到该院工作之中。



**1975年4月** 他以石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参加了在吉林省吉林市化工厂召开的全国石化工作会议。

**1976年4月上旬** 在化工部清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过程中，他有意向上面少报了一个花圈（这个花圈是本院两位技术人员，在4月5日凌晨这个敏感时间段送往天安门广场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革命群众，又一次受到“四人帮”势力的政治凌辱和迫害。

**1977年春** 第一次突然休克。经紧急抢救，转危为安。

**1977年5月** 在石科院抱病主持传达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

**1977年冬** 第二次突然休克。经紧急抢救，转危为安。

**1978年6月** 化工部令他离职去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二期高级班学习。

**1978年9月** 在党校还未毕业，未找本人作任何谈话的情况下，化工部下文免去了他担任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职务，任命他为化工部科技局顾问闲职。实际上是罢官夺权，弃之不用，继续给予不公正的对待。

**1979年1月** 从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二期高级班毕业。

**1979年2月**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他把在接近自己人生古稀之年之时重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队伍，看作是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他不顾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威胁，怀揣急救药品，坚持参加法制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每一次全会、分组会和专题研讨会，从不请假缺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参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繁重的法律体系创建工作。他抱病审阅了大量国家急需出台的基本法律和配套法律的征求意见稿，为了按时交出评审意见或准备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言，他经常忍受着高血压的极限折磨，撰写、修改自己的文稿到深夜。他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气力，为自己舍生忘死、忍辱负重、毕生追求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最后的贡献。

**1979年3月1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他抱病出席了这次会议。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 他列席参加了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表决批准通过了凝聚着法制委员会全体法律工作者心血和汗水的7部重大法律。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创立7部法律，是法律史上的奇迹。他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之一。

**1979年8月4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中发〔1979〕53号）。这个中国现代最大的文字狱，使他和全国几万名干部惨遭迫害。

1980年2月6日 《刘志丹》平反后，李建彤同志（刘景范夫人，小说作者）将工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刘志丹》赠他指正留念。

1980年3月7日早晨7时 他心脏病严重发作，摔倒在家中办公桌旁边，桌上还摊开着急待他处理的法律文件。经积水潭医院全力抢救，病情好转后转入北京医院。

1980年5月26日凌晨3时 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68岁。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80年6月17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书面作出了《关于为谭生彬同志平反的结论》，对其“因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受株连的问题”和“被错误撤销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的问题”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6月28日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隆重举行。

1980年6月30日 他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会由余秋里副总理主持，化工部部长孙敬文致悼词。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乌兰夫、余秋里、彭冲、宋任穷、李井泉、康世恩、薄一波、江华、黄火青、康克清、杨静仁、刘澜涛、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史良、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敬献了花圈。

1980年7月1日 新华社就他的逝世发出了电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他逝世的消息。

1980年7月2日 《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刊登了新华社电讯，并刊登了他的遗像。

谭生彬同志永垂不朽！

无尽的思念

# 我们的父亲

——纪念我们敬爱的父亲谭生彬诞辰一百周年

谭永毅 谭元媛 谭永林



今年 5 月 18 日，是我们敬爱的父亲谭生彬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

1980 年 5 月 26 日凌晨 3 时，父亲在北京医院郁郁而终，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

父亲病逝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他正式作出了书面平反结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花圈，为他昭雪沉冤，彻底恢复了名誉。

我们的父亲 (1979)

在 32 年前的追悼会上，党中央肯定父亲“为创建、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立和健全人民监察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做出了积极贡献”，称赞他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优秀党员”，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很高评价。

—

父亲的一生是光荣的——

1

1912 年 5 月 18 日，父亲出生在陕西省延长县安沟乡阿青村一个贫农的家庭里。他在延长县第一高小就读时参加的革命。1926 年的中国，北伐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革命浪潮席卷神州。父亲和全校师生一起，高呼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上街示威游行，冲击县衙；下乡鼓吹革命，建立农会，成为延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当时，他才 14 岁。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许多意志薄弱者背叛了革命。在大革命失败的逆境中，父亲不仅没有退缩，反

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走上了一条终身“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忠诚战士——我们为父亲感到骄傲！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延长党组织几次与陕北特委失去联系，活动几陷瘫痪的情况下，父亲和其他一些同志，或深入农村发展党的力量，或深入匪巢开展兵运……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1930年春，父亲和赵文蔚、刘子善同志在后九天土匪杨庚五部开展兵运时，第一次见到并认识了高岗。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建国后会出现什么“高饶反党集团”；更不会想到就是因为自己认识高岗，就是因为自己是西北干部，每次政治运动都会被疑为“高岗在西北的残余势力”，受到质询和批判。当然。受此“殊荣”的不只爸爸一个，还有张秀山伯伯、刘景范伯伯等一大批西北（特别是陕甘）老干部——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历史和父亲们开的这个“玩笑”实在太大了，让人消受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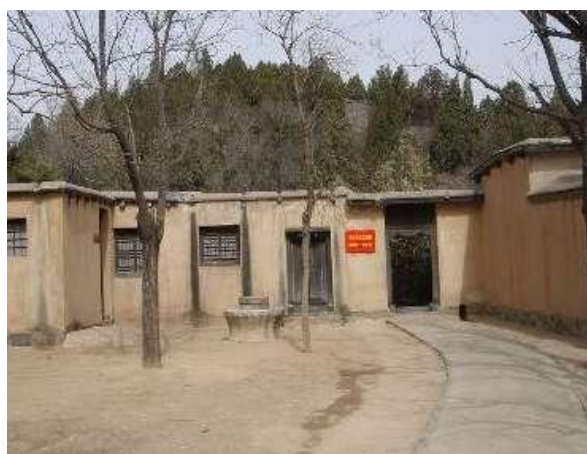
1933年冬，陕甘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召开了著名的“包家寨会议”。刘志丹同志当时已从南山突围回来，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堪称“西北地区的遵义会议”。会议痛斥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挽救了陕甘地区革命的危局，指出了陕甘党和红军的正确发展方向。

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1935年5月28日，刘志丹、高岗率红26军、27军主力激战三小时，一举解放了延长县城。这也是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第二次围剿的重要一战。从此，延长县成为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政权建立后，父亲先后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延长县历史上第一位红色行政首脑。“双十二事变”延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父亲又出任第一任县长。

如今，只要我们回到乡里，许多老人就会拿出保存得很好的、当年父亲当政时发给他们的那张《土地所有证》给我们看。他们用颤抖的手指，指点着《土地所有证》上盖着的“谭生彬”三个字，向我们诉说着父亲当年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话语间、眼睛里充满了感激……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谭生彬”三个字的印泥颜色已经发暗，但字迹依然是那样的清晰。我们知道，人们的这种感激不属于父亲个人，她属于我们的红色政权，属于我们的党。“为人民服务，替人民谋利”——这是我们党得天下、坐天下的根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更是邓小平精辟界定

的社会主义本质。想想现在大好形势下涌动的那些暗流，想想那些泛起的沉渣，想想正在一步步吞噬我们党的肌体的腐败之风，想想社会上那么多与“本质”不尽符合的地方，再想想那些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长眠于九泉的先烈，我们怎能不在为大好形势高兴之余，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但愿我们的这个担忧是杞人忧天吧！

父亲经常对我们讲，他一生中最感“得意”的主要有两件事情：一件是参加了刘志丹的红 26 军，一件是东征时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毛主席延长旧居**

父亲生前很少向我们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但参加红 26 军是个例外。父亲在红 26 军时间不长，但经历的却是红 26 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段——兵败终南山。骑兵连掩护全军突围，贺耀华班长壮烈牺牲的情景；刘志丹同志跳上岩石，挥枪北指，高呼“工农革命一定胜利”的身影；父亲和枣红马生离死别的故事，和王兆

相伯伯破枪出山的故事，和那一对素不相识的农民夫妇的故事……这些故事，一件件，一幕幕，都深深地铭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

每当父亲讲起红军东征路过延长，被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情景，都会激动不已。毛主席的雄才伟略，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及了解下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都给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们最爱听父亲讲他写信向毛主席要枪，毛主席亲自批给他一把三号驳壳枪的故事。而“我是大主席，你是小主席，你这个小主席搞得很不错嘛！”——这句毛主席在石油厂餐桌上当众对父亲讲的话，更是成为史料工作者研究红军东征路过延长这段历史时的一个经典，成为父亲一生的光荣！

## 2

父亲是服从组织安排，听从党的调遣的模范。从 1940 年 10 月起，父亲在延安整整工作了九年。由于工作需要，九年时间里，父亲调动了六、七个单位，担任过边区粮食局局长、边区抗战动委会副主任、民政厅视研室主任、延大行政系副主任、延安专属副专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做到了哪里需要去哪里，随时听从党召唤，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10月，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合并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后，为搞好两军合并后的干部调配和团结，父亲更是坚持五湖四海，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热诚关心每一位干部，相忍为党，舍私为公，和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战斗力，为我军的组织建设做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父亲平易近人，真诚待人，名利让人的工作作风给接触过他的军队干部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父亲是我党纪检、监察战线上的老战士。

1950年3月，他响应中央号召，主动请求转业，再次离开了他钟爱的部队，带领一批干部转业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务。他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忘我工作，打击、惩治了许多坏人，挽救、保护了不少同志，为建立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国家的人民监察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5年2月，父亲奉调进京，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工业监察司司长。我们都知道，1955年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否按时完成“一五”计划的决定性一年。为保证“一五”计划的完成，他带领年初刚刚组建的工业监察司，克服重重困难，对全国工业系统存在的物资积压、安全事故、生产废品、保管不善、贪污盗窃等一系列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严厉的查处。办案过程中，父亲身体力行，亲自深入一线调查研究。1955年一年中，他在工矿企业出差的时间就达10个月之久。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全部超额完成。这一计划的胜利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这胜利中，包含着人民监察机关不可磨灭的功勋。

1957年7月18日，周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085号任命书，父亲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助理。面对职务的升迁，父亲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铭记党的重托，在这一岗位上，尽职尽责，协助钱瑛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

特别是1979年2月。饱经“文革”等政治磨难的父亲，在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后，更是把在接近古稀之年时重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队伍，看作是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他不顾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威胁，

怀揣急救药品，坚持参加法制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每一次全会、分组会和专题研讨会，从不请假缺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参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繁重的法律体系创建工作，抱病审阅了大量国家急需出台的基本法律和配套法律的征求意见稿。为了按时交出评审意见或准备在第二天会议上的发言，他经常忍受着高血压的极限折磨，撰写、修改自己的文稿到深夜——他这是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气力拼搏啊！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父亲列席了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表决批准通过了凝聚着法制委员会全体法律工作者心血和汗水的七部重大法律。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创立七部法律，是法律史上的奇迹。我们的父亲，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之一。

## 二

父亲的一生也是坎坷的——

### 1

“青海地大物博，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这是朱德委员长1958年7月视察青海省时写下的一句脍炙人口的题词。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十分可爱的地方，竟会成为他一生厄运的开始……

1958年4月，中央监察部撤销。4月初，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找父亲谈话，通知他，中央决定调他任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并征求他的意见。“中央既已决定，我没意见。”父亲一辈子服从组织安排，这次也不例外。“青海地处高原，听说你心脏不太好……”“没问题！别人能去，我也能去！”父亲淡然一笑。

谈完话，父亲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和我们。“我不去！我要在北京上学！”小关哥首先表示反对。妈妈也说北京的学习条件好，让父亲一个人去，她留在北京照顾我们。兴冲冲的父亲，被我们当头浇了一瓢凉水，一下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阴沉着脸、斩钉截铁地说：“这事没商量，全家都得去！”他略停了一下，缓和了一下语气，又对妈妈说道：“光宇，孩子小不懂事，你是党的干部，你好好想一想……组织上调我去青海，既然同意去，那咱们就得实心实意地去，全心全意地去……我去青海，你们留在北京，群众会怎么看、会怎么说？”就这样，在父亲的坚持下，我们全家踏上了去青海的路程。（其实，后来不少从北京调到青海的干部都是光杆一人来的——不过，我们并不后悔！）

父亲到青海后，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经常深入高寒牧区，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为早日改变青海省的落后面貌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父亲先后分管过财贸和文教口的工作；经历了青海省解放以来最困难、最复杂的三个时期。一是平叛，二是大跃进，三是三年自然灾害。

青海牧区的叛乱，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发生的几起大规模叛乱的一部分。中央成立了平叛总指挥部。毛主席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日子来到了！”

刚开始，叛匪气焰十分嚣张，攻我县城，杀我干部，暴行令人发指。为了不让我们担心，父亲没有把发生叛乱的事告诉我们。后来我们发现他经常看地图，还从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有关平叛的情况通报，才知道了这件事。在我军猛烈打击下，平息叛乱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也给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了整人的口实。

由于“左”的思潮特别是“浮夸风”，青海省的大跃进确实出了问题，确实饿死了人，这是事实。中央发现并处理了青海的问题。错误是省委领导班子集体犯的，作为第一书记，高峰伯伯承担了主要责任；父亲和书记处其他书记也都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六十年代初，高峰伯伯调离青海，临走时对父亲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老谭啊，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坏人。我们都想把工作做好，结果却违背了客观规律……对不起中央，对不起青海人民……”这是高峰伯伯的心声，也是父亲的心声，更是整个前青海省委领导班子的心声！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和省委、省人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与全省人民同甘共苦，自觉削减了自己的细粮和肉食，苦苦菜、头发菜、地软等野菜成了我们饭桌上经常可以见到的佳肴。玲玲弟和五娃（薛宏福叔叔的小儿子）在一次外出采集野菜时，误食野菜中毒，上吐下泻，几乎要了他俩的小命。

父亲在青海的被撤职，在许多人眼里一直是个谜，大部分人都以为是因为大跃进中的错误。其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父亲和其他叔叔伯伯一样，对他们在青海大跃进中犯下的错误是痛心疾首的。他们积极反映并参与了对原省委错误的清算，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清算结束后，除第一书记、农业书记、农业副省长外，中央保留了父亲和朱侠夫等人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继续在新省委工作。

父亲他们对新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是支持的，对新省委纠正原省委错误

是拥护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他们对新省委某主要负责同志在纠正错误过程中采取的一些做法和由此出现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看法，并在正式场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父亲他们认为，青海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纠正这些错误是正确的、必须的；但是，青海大跃进中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不能全盘予以否定。

父亲他们还认为，青海大跃进中的错误是省委犯的，下面的干部是执行者，打击面不能太大，不能搞惩办主义。当时，新省委某主要负责同志在纠正错误的名义下，撤换、惩治了一大批干部，群众惊呼他“是不是犯了职业病？！”

“张贵德问题”，也是父亲他们和新省委某主要负责同志分歧的焦点之一。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父亲愤起发问：“张贵德同志十几岁参加革命，红小鬼出身，你们现在说他是特务——那么请问，他是敌人拉出去的，还是打进来的？！”字字句句，掷地有声。父亲仗义执言，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度党性原则和大无畏精神。如今，张贵德叔叔早已平反，恢复了名誉。

不仅如此，当年许多被残酷打击，撤职、降职、处分的干部，后来也大都恢复了工作和名誉。事实充分证明，父亲他们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我们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存在，没有不同意见反而是不正常的。对待党内不同意见的唯一正确态度，应如毛主席所说：“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而省委某主要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他把父亲等人的善意批评，说成是反对纠正青海的错误，说成是在反对他，而反对他就是反对新省委，反对新省委就是反党——大家看看，这是一条什么逻辑？！他把父亲和朱侠夫伯伯等视为自己工作中的“阻力”，早就想让他们离开新省委，只是没有机会。

1962年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随着《刘志丹》反党小说的定性，“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揪出，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和青海省委某主要负责同志认为时机已到。会议还未结束，就在一起研究要在青海整掉一批“习仲勋反党分子”，并把即将召开的青海省委三届七次会议的调子定为“纠正错误和反纠正错误的斗争”。厄运，开始降临到了父亲的头上，一场长达十八年的冤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就公开放话：“彭、高、习在西北几个省的影响很深，流毒极广，要彻底批判和肃清。”大造准备整人的舆论。

1962年9月，青海省委三届七次会议即将召开前夕，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又几次打电话给青海省委某主要负责同志打气，说：“青海省委领导班子里有股恶势力，你们受压的同志不要怕……”还说：“……纠正错误和反纠正错误的提法还不够，实际上是维护党的团结与分裂党的团结的斗争；是坚决拥护党中央路线、毛泽东思想与反党中央路线、毛泽东思想的斗争。”

——准备整人者磨刀霍霍，调子不断升级。而这一切，善良的人们是不知道的。

1962年10月，青海省委三届七次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省委某主要负责同志就按照预定计划，率先向父亲发难，要父亲交待和“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关系、和反党小说《刘志丹》及其作者的关系，并把父亲和朱侠夫、张俊贤（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刘泽西（省委常委，西宁市委第一书记）等伯伯诬为“习仲勋在青海省委的地下司令部”，批斗了几十天。父亲是他们批斗的重点对象，身心受到很大摧残；母亲（在支部会上几次被批斗，要她揭发父亲的所谓问题）和我们也受到了株连（入不了团，遭人白眼）。

父亲没有被他们的淫威屈服，自始至终，坚持申明：我和习仲勋的关系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正常的同志关系！

整人者们不理睬父亲的申明，我行我素，照整不误。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几十天过去了，“罪名”列了一大串，“帽子”扣了一大堆，可就是作不出“反党”、“反新省委”的结论，就是打不成“习仲勋反党分子”！这可怎么收场？1962年11月中旬，省委某主要负责同志在常委会上传达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指示时，心有不甘地说：“被批判的几个人实际上是反党，只是不给他们公开戴反党帽子罢了！”作为一个整人者，“Q精神”有时还是很重要的——不是吗？！

1962年12月，在未有任何“反党”结论的情况下，父亲被宣布撤销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调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当时，父亲和我们都以为这是中央的决定。父亲曾多次找安子文反映情况，安以种种借口就是不见。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父亲曾到河南省新乡专区七里营公社搞了七个月“四清”，他同那里的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四清”结束返校时，许多人拉着父亲的手，哭着不让走……

1965年10月，父亲党校毕业。因他在党校学习期间，始终对青海问题保留

意见，被视为坚持错误，学得不好，下放燃化部锦西化工厂任副厂长。

离京前，父亲去看望了他的老上级、原中央监察部部长钱瑛。向她诉说了自己的冤屈和意见。钱瑛听完，没有多说什么，要他“服从组织决定”。父亲望着面前这位他曾经十分敬赖的大姐，沉默了许久……最后，苦笑着说：“好吧，这个世界上也不多一个冤死鬼，我就当一回冤死鬼吧！”

到锦化后，父亲把自己的意见和冤屈深深埋在心底，事事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尊重，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谭头”、“老八级”（父亲的行政级别是八级）。

直到1971年7月，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才从“造反派”口中得知——他当年的被撤职，并不是中央的决定，而是那位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背着中央搞的鬼。一生痛恨阴谋的父亲，十分震怒，提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再次就“青海问题”提出申诉。毛主席收到父亲的来信后，亲笔批示中组部调查处理。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中组部干审局局长王硕代表中组部于1973年冬找父亲面谈了调查结论。

王硕同志对父亲说：“你的撤销职务处分问题，是刘××私自篡改中央电报，假借中央名义下达的。中央调你到党校学习，没有给你处分，有电报可查。西北局书记处没有讨论过你的处分问题，都有人可证。现在已经查清，这个处分宣布无效。”听到这个结论，父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几乎落泪。

然而，中组部和父亲当时都犯了一个不应犯的错误——那就是：中组部没有为父亲作出一纸书面的正式平反结论；而父亲，在庆幸自己终于卸掉政治包袱，又能轻装上阵，重新为党工作的同时，竟也没有向中组部要这样一个书面平反结论——在他的档案里，放着的依然是青海整他的那些材料，依然是当年的那个所谓“处分”，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文件去否定这些东西——搞了一辈子党的工作（包括组织工作）的父亲，真是高兴得昏了头，竟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正是由于这个低级错误，致使对父亲的降职使用，在1973年中组部作出口头平反结论后还在继续，一直延续到1980年5月父亲去世。至此，父亲蒙冤已整整十八个年头——整整十八个年头啊！

父亲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没有留下一句话。他在病榻上写给中组部宋



任穷部长那封要求组织上为他做书面平反结论的信，便成了留给组织、留给我们的最后要求和遗嘱。经妈妈带我们多次交涉，中组部终于于1980年6月17日为父亲作出了书面《平反结论》，正式为父亲平反，彻底恢复了名誉。这个书面的《平反结论》虽然迟到了，但毕竟作出了。这说明，我们党是关心爱护自己干部的，是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永远蒙冤受屈的。

九泉之下，父亲可以笑慰了……

## 2

父亲一生中的坎坷，并不只限于青海。他“文革”中在锦西化工厂遭受的磨难，可以说是“青海磨难”的继续。

“文革”中，父亲和洛仁、吕鹏飞、刘金波、安庭等伯伯，头上戴着用钢筋做成的、几尺高的高帽，脖子上挂着用极细钢丝吊着的、几十斤重的大牌子，五花大绑，跪在满是瓦砾、砖块、玻璃渣的车厢里被“造反派”拉着游街批斗的情景，至今想起都让人觉得心痛，永远难以忘记……

工人文化宫里的批斗，更是家常便饭。喷气式的折磨，九十度的弯腰，一弯就是几个小时。每次批斗，父亲他们头上淌下的汗水都会在身前滴聚成一个小水潭。当批斗结束，“造反派”喝令他们“滚出去”的时候，他们却仍久久地弯在那里，“滚”不出去。因为，他们的腰和双腿早已僵直，根本就无法移动……

每次批斗回来，父亲都默默地坐在那里，一支一支地抽着烟，许久不说一句话。从他脸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有一次，久坐的父亲“呼”地拍了一下桌子，腾地站了起来，大喊了一声：“就你们革命？！”二目圆瞪，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这是父亲在“文革”中，当着我们面做出的唯一的一次爆发！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我们都哭了……

父亲在锦化的“牛棚”（该厂实验室）里被整整关押了三年。数九隆冬睡在冰冷的水泥台子上，吃得是砂子很多的凉高粱米饭……非人的虐待，使父亲在战争年代留下的胃病严重发作，几乎病危。若不是母亲强撑病体、哭着坚持千方百计做些可口饭菜给父亲送去，他老人家恐怕早就惨死在“牛棚”里了……

这种精神上、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对父亲这些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来说，真是一种奇耻大辱！当年，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横眉冷对，从未低下过自己高傲的头！可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听毛主席的话，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除修正主义温床而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除了“正确对待”，他们又能怎样？！

这是革命群众啊！

同住一字楼的刘金波伯伯（锦化副厂长），和父亲在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时就认识。有一天，他到我们家串门，掩不住一脸愁绪，悄悄问父亲：“老谭，延安整风时也没这样……这回主席是怎么啦？”父亲苦笑着没有说话。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也正想请人回答同样的问题。

父亲受难的同时，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受尽了屈辱。玲玲小小年纪，整天被过去的小伙伴追在屁股后头骂“狗崽子”，欺负得有学上不成；元媛才上初二，就因父亲的事在班级里几次遭到同学们的批斗；小关更是被诬为父亲“伸入群众组织的黑手”，整得死去活来，险些卧轨自尽；就连智障残疾的安生，走在街上也会被人随意辱骂，推来揉去……特别是我们的妈妈，身患严重的肝病，仍被强令到土建车间接受劳动改造，致使病情越来越重……

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要感谢这场最终成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仍要感谢那些曾对父亲“拳脚相加”的“造反派”，特别要感谢锦化二总部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在西北局外调时发现了刘××的问题，并把真相及时告诉了父亲，父亲遭受的政治冤屈可能就不止十八年，而会是一辈子！今天，在我们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要对在当年那场浩劫中，关心、保护过父亲的所有同志们说一声：“谢谢！”

### 3

1974年父亲调回北京，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核心小组的组长是李苏同志（原化工部副部长、化学硕士）；第二副组长是侯祥麟同志（原石油部技术司副司长、留美化学博士）。父亲出身工农，与他们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学历更是天上地下。但是，他们彼此尊重，相互补台，合作得十分愉快——因为，他们都是党的干部，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

重获工作权利的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该院工作之中。有时一忙，饿了就在办公室吃碗方便面，困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晚上连家都不回……六十多岁的人了，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干劲，让许多年轻人叹服。

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四·五运动”爆发。“四人帮”及其爪牙开始了对悼念总理者的大追查。在京化工系统有不少群众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并为总理献了花圈，时任化工部主要负责同志孙××奉命指示各单位严查。为了尽可能保护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父亲在不得不查的情况下，有意少报了一个4月5

日凌晨送往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这是一个敏感时间段——如果报上去，送花圈的两位技术人员极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

谁知，这个情况竟被人密报到部里。孙××十分生气。在化工部4月12日召开的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他当着众多干部的面大声喝问：“谭生彬来了没有？！站起来……你识数不识数？！到底是四个还是三个……你是不是想包庇反革命？！”父亲革命一辈子，还没有在党的会议上、当众受过这样的人格污辱。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强压怒火，没有发作……回到家里，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只是呆呆地坐着。过了好一会儿，忽然“哼”地冷笑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你吼也没用，老子就报三个！”

“4·12”辱骂，深深刺伤了父亲的自尊。1980年4月中旬，病重住进北京医院的父亲，和前来看望他的老战友、中组部副部长白治民叔叔说起这件事时仍然很激动。他说：“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群众批斗不算，在党内正式会议上，遭受这样肆无忌惮的辱骂，只有这一次！”

### 三

父亲和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和普通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 1

1977年7月23日，朱侠夫伯伯在遭受政治上的长期磨难后于北京医院病逝。他也是郁郁而终的。

朱伯伯是陕西榆林人，1926年参加革命，长父亲一岁。父亲和他在延安时期就认识。1958年父亲从北京调青海时，朱伯伯已是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他们在一起共事了五年，一起经历了青海的风风雨雨，一起被当作“习仲勋反党分子”批斗了几十天……他们是同事，是战友，也是“难友”，彼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朱伯伯去世后，看着以泪洗面的杜如谦阿姨（朱伯伯夫人），父亲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不甘心让自己的老战友——生前受到那样大的政治冤屈，身后又这样默默冷清地离去——他驱车赶到王震同志家，含泪向王震同志诉说了朱伯伯的情况，恳请王震同志参加在北京医院为朱伯伯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王震同志对西北干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没有推辞，欣然同意，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告

别会场，看望了杜如谦阿姨，看望了朱伯伯的孩子，在朱伯伯的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

王震同志的出席，提高了朱伯伯遗体告别仪式的规格，为朱伯伯赢得了政治生命中的最后一份荣誉。这也是父亲重新工作不久，在自身也很困难的情况下，为自己的老战友、为朱伯伯尽的最后一点微薄之力。

## 2

1980年3月11日，父亲住进积水潭医院，几报病危。经积水潭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病情渐趋稳定后，于4月份转入了北京医院。

当时，已复出的那位原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刚巧住在父亲病房的隔壁。他听说谭生彬住在旁边，便主动过来看望。父亲请他坐下，同他谈起过去的事情。当谈到青海问题时，父亲告诉他：“张耀生同志（高峰夫人）和杜如谦同志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目前情况都不很好，很困难……听说朱侠夫同志的小儿子在“文革”中不堪屈辱自杀了……希望组织上能够关心一下，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帮助……”父亲神情严肃地讲着，刘××也神情严肃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点头，但始终没有表态。

看望结束后，大关哥扶送他出病房，边走边对他说：“阿姨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他的爱人也是在文革中自杀的）……望您节哀，保重身体！”刘××的脚步顿了一下，转头看了看大关，很感动的样子。

然而，张耀生、杜如谦阿姨的处境并没有因为他的“点头”和“感动”，而有任何地改变……

## 3

父亲对妈妈的爱是深沉的。妈妈在他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父亲的眼里，妈妈不仅是他深爱的妻子，更是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十七年，风雨同舟，不离不弃。虽然，他们平时也有磕碰和口角，但我们看得出，爸爸是深爱着妈妈的，这种爱任何人都无法替代。妈妈也是如此。两位老人家都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爱意，没有浪



爸爸和妈妈在一起（1950·西安）

漫，没有卿卿我我，他们都把对对方的爱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底，即便是在吵架

斗嘴，彼此恶言相交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其实仍在爱着对方——这在有些人看来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

“没能让妈妈过上一天安稳舒心的好日子，让妈妈跟着他担惊受怕，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父亲嘴上不说，但我们看得出，这是埋藏在他心中的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歉疚和痛苦。他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时带走了许多遗憾，这恐怕是最大的一个！

在我们中国，在那一场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有不少高级干部的妻子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但妈妈没有。作为父亲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在父亲遭受迫害、最为痛苦的日子里，她顶住压力，始终陪伴在自己爱人的身旁。可以说：没有妈妈的支持、安慰、鼓励和呵护，父亲就不可能活到今天！

在我们的耳旁，至今还迴响着父亲去世噩耗传来，妈妈候车赶往医院时，在楼道里发出的撕心裂肺般的哭声；在我们的眼前，至今还浮现着遗体告别结束，准备起灵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妈妈呼喊、挣扎、拼命扑向父亲遗体的身影……这是妈妈几十年来对父亲感情沉积的总流露、总爆发——这种感情，这种爱，我们是体会不到的！

在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要对如今永远陪伴在父亲身边的妈妈大声说：“敬爱的妈妈，您的儿女们想念您！感谢您！”

#### 4

父亲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他从来没有以高级干部自居过。父亲去世后，我们在纪念他的一首诗里写道：“身在高干中，心与百姓通。廉洁奉公不忘本，清贫度一生。”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父亲把名利看得很淡。我们不止一次听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职务是权，级别是钱。“权”很重要，有了它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钱”要看的淡些，够吃够用就行了。他一生中，曾两次主动让级。1952年按条件就应评为六级的他，直到1980年去世，行政级别还是自己当年要的那个八级。他自己让级还不算，还“利用”自己当时主管西北两委评级工作的权力，坚持让组织上把妈妈的级别也从十四级改成了十六级……现在，许多参加革命比他们晚、资历比他们浅的同志，级别都跟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了他们。每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都不是滋味，都替他们抱屈，都说爸爸太“傻”——对此，父亲总是淡然一笑，跟没事人一样，没有一点悔意。

过去，我们一听有人说父亲因在青海犯错误，“从六级降成了八级”，还跟人家急，跟人家争辩说“不是！”其实，从“让级”这个角度看，爸爸还真是从六级降为八级的——只不过不是因为犯错误“降”的，而是他自己不要，主动“让”的罢了！

父亲对身旁的工作人员十分爱护，平等相待，视为家人。他先后有过几个警卫员，如曹万宝、慕明荣等。其中明荣大哥跟随父亲的时间最长，从西安跟到北京，又从北京跟到青海。他的年龄和永泰大哥相仿，父亲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青海当时社情复杂，敌特猖獗，明荣大哥和省委保卫组其他警卫人员一起，为保卫父亲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安全，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作了大量的工作。后来他调到省劳改局工作，成家后，经常带着爱人、孩子来看望爸爸、妈妈，就跟走亲戚一样。

在当时那个年代，组织上为了照顾省委领导的生活，给各省委书记家都配有保姆。蔡秀琴阿姨是在我们家工作最长、最好的一个。无论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在父亲遭受迫害、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蔡阿姨都始终守护在我们家里，即便有时受到一些委屈，也从不记恨，踏踏实实，毫无怨言，为我们烧菜做饭，收拾家务，悉心照料着爸爸、妈妈和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印象里，父亲从来没有对她发过一次脾气，说过一句重话。

“谭书记和李大姐是好人呐！”——蔡阿姨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对别人讲过这样的话。她同我们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开青海后，我们至今一直和她保持着联系和来往。2008年元月妈妈去世后，蔡阿姨专程从西宁赶到北京奔丧，在妈妈的遗像和遗体前悲痛欲绝，痛哭失声。

还有他的秘书黄清仁，也是中央监察部撤销后，跟着父亲一起来到青海的。在日常工作中，他根据父亲的要求和提纲，为父亲起草了大量的文稿，经常受到父亲的赞许，是父亲的好帮手、好参谋。在1962年父亲挨整的那段日子里，作为父亲的秘书，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他顶住了这种压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胡揭、不乱咬，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秘书应有的党性原则和职业操守。父亲对他的工作和表现是满意的，并和妈妈一起，对他的个人生活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帮助。父亲被错误撤职后，他也被迫离开省委，调到武汉的一个什么单位工作……多少年后，每提起当年的这些事，父亲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总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们（包括蔡阿姨、慕大哥）……

父亲关心每一位群众，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和兄弟，总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帮助。粮票、布票、棉花票、购物卷——这些东西当年是很紧缺、很金贵的，我们家平时自己都舍不得用。但是，父亲和母亲却可以毫不吝惜地把它们送给那些困难群众。记得在锦西化工厂时，有一年冬天，一位部队复员的青年工人来找父亲，说他家里连一床过冬的像样棉被都没有，父亲、母亲十分同情，就送给他一些布票、棉花票，帮他过冬。他拿着这些布票和棉花票，激动得哭了起来……当时父亲的眼圈也红了，他拉着这位青年工人的手，深情地说：“不要哭，我也是一个老兵……”

还有一次，一位姓何的老同志从山西写信给父亲，请父亲帮着照顾一下他在锦西工作女儿，并设法把她调回北京。这位老同志是父亲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当时政治问题还未解决。父亲把他的的嘱托当作一件大事，不顾自己才刚获解放的窘境，舍下自己的老脸，多次找厂革委会和军代表商量、甚至哀求，终于为这位老同志的女儿争取到了一个调京名额。这位老同志的女儿调京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提出要换到另外一个单位，父亲又舍下老脸，达到了她的满意。父亲之所以能为她舍下自己的老脸，就是因为她是自己老战友的女儿，而自己的这位老战友还在难中……父亲是过来人，他深知一个政治蒙冤者的处境和心情。“老战友还在受难，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既然开了口，我就不能不管！”——这，就是我们的父亲！

后来，每当我们谈起父亲帮这位老战友女儿调工作的事，都会流露出些许羡慕和嫉妒。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因此抱怨过父亲。

父亲不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对儿女们的爱，但是，我们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他的爱。他的爱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我们上学时，我们生病时，我们玩耍时，甚至我们调皮时，都能感觉到他的爱……他为我们着急时的神情，他教诲我们时的严厉言辞，他的一颦一笑，都在传递着他对我们的深沉的爱意。

“青山处处留忠骨”，“哪里黄土都埋人”。这是父亲生前最爱对我们说的两句话。他把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对同志的诚信……把一个革命者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毫无保留地传承给了我们——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我们的真正大爱！

2010年9月18日，我们在纪念刘景范伯伯百年诞辰的书面发言中这样写道：



“从景范伯伯这样共产党人的遭遇，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和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不行；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不行；同样，没有无数被党和自己人误解、怀疑之后，仍能同党同心同德，保持一致，继续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的共产党员也不行！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内乱必定会断送革命。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那样多的风浪，犯过那样多的错误，之所以没有乱，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之所以能够团结如一，坚如磐石，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无数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党忠贞不二，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真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

我们党为有这样的好战士感到骄傲！我们为有这样的好父亲感到骄傲！延长人民为有这样的好儿子感到骄傲！

我们怀念敬爱的父亲！

父亲永远活在儿女们的心中！

## 父亲追悼会二、三事

谭永毅

### 一、“我一定要参加”

1980年5月26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老人家是含着冤屈，郁郁而去的。

二十二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父亲正式做出了书面平反结论。

《结论》首先指出：“一九六二年十月，青海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曾要谭生彬同志交代检查与习仲勋同志的所谓关系问题和小说《刘志丹》的有关问题。……事实证明，谭生彬同志与习仲勋同志是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根本不是什么‘反党’的问题，当时对其按‘反党’‘反新省委’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完全是错误的。根据中央批转我部〈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对谭生彬同志因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受株连的问题，应予彻底平反。”

《结论》接着指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在关于青海省委领导干部配备问题的批复中，同意将‘谭生彬同志送中央党校学习’，但原西北局负责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给西北各省、区通报时，改为‘谭生彬，撤销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职务，送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此后，谭生彬同志长期受到降职使用。此事应以中央批复为准，原西北局通报中给予谭生彬同志撤销职务的处分是错误的。为谭生彬同志平反，恢复名誉。”这里说的“原西北局负责同志”，就是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

中央给父亲的追悼会以很高的规格。也许是考虑到上述原因，在中组部报请中央批复的、参加父亲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没有刘澜涛的名字（其当时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知道后，立即向有关方面表示：“谭生彬同志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

6月30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会会场庄严肃穆。父亲的遗像前安放着他的骨灰。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骨灰盒前

面端放着妈妈率我们敬献的花圈。礼堂四周，花圈一个挨着一个，一直摆到礼堂门外。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送的花圈格外醒目。



**刘澜涛同志**

高登榜叔叔带我们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休息室。余秋里等中央同志和妈妈亲切交谈。刘澜涛果然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满头银发，面目慈祥……如果不是有父亲的亲身经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和蔼可敬的老人，当年怎么竟会干出那样的事情？！

追悼会开始，悼念的人群缓缓走过，依次和我们握手、慰问。刘澜涛缓步走到妈妈跟前，握着妈妈的手，躬着腰，

轻声说道：“对谭生彬同志的错误处理我要负主要责任。我向死者道歉，向死者的家属道歉！”“谢谢！”妈妈表情凝重，冷静地回答。面对满脸愧容的刘澜涛，妈妈表现出一个老同志、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受害者家属应有的气度和胸怀。

“文革”中，刘澜涛身陷囹圄，老伴自杀。他从一个整人者，变成了一个被整者，亲身体会到了整人者的可恶，感受到了被整者的痛苦。当面向妈妈道歉、向父亲忏悔——这恐怕就是他执意要参加父亲追悼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道歉和忏悔来的太晚，但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 二、“你的父母官死了”

“你的父母官死了……”——高登榜叔叔打电话，把父亲去世的消息，通知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登榜叔叔说的没错。班禅是青海省循化县人，父亲当年当过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自然是他的父母官。

班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周总理评价他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邓小平称赞他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因工作需要，那时，他经常奔波于北京、拉萨之间，西宁是他的必经之地。迎来送往，确保安全，是青海省党政的一项重要任务。省委、省府的领导和他关系甚熟，父亲也不例外。

六十年代初，有一次，班禅来到西宁，省委在宾馆大礼堂为他准备了一台招待晚会。我还清楚记得班禅入场时的情景：当时全场的人一下都站了起来，发出了热烈的掌声。班禅笑容可掬，挥手向大家致意，同迎上前来的父亲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一握手，亲切交谈，没有一点架子，就像老朋友一样。父亲和班禅握手时的姿势、神态，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时，班禅才二十多岁，年轻、高大、英俊、和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十世班禅大师

班禅认他的“父母官”——

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的心情很沉重。他让高登榜告知有关方面，父亲的追悼会他也要去参加。

追悼会上，他和妈妈亲切握手。在父亲的遗像和骨灰前深深鞠躬。还把我大哥的孩子容容、浪浪叫到身边，伸出厚实的大手，轻轻抚摩着两个孩子的头顶，为他们摸顶赐福……

我望着班禅悼念父亲的虔诚身影，心里涌起一股热流。我感谢班禅大师莅临父亲的追悼会，感谢他对父亲的情义和真诚……

### 三、最后的告别

“灵床起，心相随，胸前白花洒满泪。

今日长诀别，何时再相会？！”

——这是1980年6月28日，在北京医院和父亲遗体告别后，我写的一首悼诗中的一部分。准备“盖棺起灵”的一刹那，妈妈不顾众人拦阻，悲痛欲绝地呼喊着“老谭！老谭啊……”，挣扎着扑向父亲遗体的情景，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

同样，我也永远永远不会忘记1980年6月30日，妈妈带领我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和父亲生死永诀的情景。

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余副总理用沉重的语调宣布父亲的追悼会开始。化工部部长孙敬文从医院赶到会场为父亲致悼词。《悼词》回顾了父亲的革命一生，表彰、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父亲的光



父亲遗像

荣，也是我们的光荣！

《悼词》指出，当年对父亲的错误处理，中央已给予平反，为父亲彻底恢复了名誉——我们为九泉下的父亲感到由衷地高兴！

党和国家领导人，父亲的老同事、老战友，国家机关和本单位的干部群众，大约有五百多人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在亲属队列前缓缓走过，同我们亲切握手，表示慰问。队伍中，有人低头呜咽，有人仰天恸哭……这呜咽，这

恸哭，无不表达了人们对父亲的深切思念。

肖佐汉叔叔、马亚夫叔叔、安庭叔叔、刘金波伯伯、郭涛舅舅等，专程从沈阳、呼和浩特、锦西、天津等地赶到北京，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

哀乐仍在耳边迴响，参加悼念的人群逐渐散去。“光宇，带孩子们过来，给老谭鞠个躬！”高登榜叔叔走过来招呼妈妈。妈妈紧抿着嘴唇，眼睛红红的，强忍着悲痛，带领参加追悼会的儿女和亲属站成了两排（其中有白瑶叔叔的儿子小平和李景膺伯伯的女儿小琴，他们从一开始就和我们站在一起）。在高登榜叔叔的主持下，我们向着父亲的遗像和骨灰深深三鞠躬，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默默祝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随后，亲属们排成一队，护送着父亲的骨灰到骨灰堂付一室安放。

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的后面是抱着骨灰盒的大关哥。他轻轻迈动着自己的脚步，唯恐惊醒了正在里面熟睡的父亲。黑眼哥和凤琴嫂一左一右，搀扶着已近心力交瘁的妈妈。妈妈的后面，紧跟着作仪嫂、燕子姐、忠迎姐夫、安生哥、元媛妹、玲玲弟、都都弟、婷婷姐、农农弟、侄孙女谋子及小平弟和小琴妹。我的小侄儿容容、浪浪懂事地跟着大人，默默地行走在队伍里，为他们的爷爷送行。

从公墓礼堂到骨灰堂，这一段路并不很长，但我们却仿佛走了很久很久。

父亲那满面笑容的遗像和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被安放在付一室的一把太师椅上。为党操劳了半个多世纪的父亲，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 家父谭生彬百年诞辰 祭文

谭永毅 谭元媛 谭永林

(2012年5月17日)

民国元年，生于阿青；五月十八，家父诞辰。  
自幼家贫，深恶不公；誓扫黑暗，造福国民。  
志士引导，刊物启蒙；笃信马列，励志革命。  
十五入团，热血沸腾；十六转党，奉献终身。  
青年领袖，威名远震；灌输真理，组织游行。  
打入匪巢，开展兵运；功亏一篑，未能成功。  
发动农民，抗粮围城；粮款减缓，大获全胜。  
紧跟志丹，参加红军；跃马横刀，作战英勇。  
兵败南山，教训惨痛；突出重围，继续斗争。  
延长解放，山河变红；县苏主席，掌权为民。  
红军抗日，渡河东征；主席接见，无尚光荣。  
白军进犯，退入农村；手提驳壳，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战线一统；延长县长，家父首任。  
土改分地，扩大红军；政权巩固，欣欣向荣。  
边区开会，民主参政；主席教诲，受益无穷。  
豹子留皮，人要留名；服务人民，党之根本。  
延属专区，竭力尽心；主席身边，责大任重。  
西北军区，肩负重任；调配干部，建军有功。

胡匪犯我，形势险峻；指挥转移，沉着镇定。  
纪监战线，为党为民；惩恶扬善，不徇私情。  
青海八年，甘苦情深；横遭迫害，蒙冤告终。  
发配锦西，忍辱负重；文革挨斗；不改初衷。  
挥笔上书，主席见信；批示调查，冤案得清。  
服从安排，调回北京；为保群众，又进冷宫。  
法制委员，蒙党信任；老骥伏枥，拼尽余生。  
病重要求，书面结论；遥盼昭雪，郁郁而终。  
人去书到，虽晚犹幸；追悼大会，规格隆重。  
主席国锋，剑英小平；中央领导，花圈如云。  
一生为党，耿耿忠心；日月可鉴，青史留名。  
山河依旧，笑貌犹存；弹指百年，永师后人。



# 怀念我们的父亲

（代结束语）

谭永毅 谭元媛 谭永林

（1980年7月1日）

仰望追悼会的横幅，  
擦干通红的泪眼；  
迈开沉重的脚步，  
走进大厅的里面——  
那四周林立的花圈  
是党和国家  
对父亲一生的肯定，  
那肃穆低垂的挽联  
寄托着多少老战友的思念；  
父亲的骨灰盒前  
端放着妈妈率我们敬献的花圈，  
父亲的骨灰盒上  
鲜红的党旗将永远和他作伴……  
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客厅接见了我们，  
亲切的话语  
给我们创伤的心灵  
带来无限温暖；  
余副总理用悲痛的语调  
宣布大会开始，  
那经中央批准的《悼词》啊，  
一字字，一句句，

在为我们敬爱的父亲定论盖棺！……

悼词里，

党中央肯定父亲

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悼词里，

党中央表彰父亲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悼词里，

我们仿佛看到父亲

正领导农民“围城抗款”；

悼词里，

我们仿佛看到父亲

横刀跃马血战终南山！……

父亲一生的最大幸福

就是直到死

都在为革命拼搏奋斗，

父亲一生的最大痛苦

就是直到死

还未能看到昭雪沉冤！

诚然，追悼会上

有人为自己对父亲的不公正待遇

鞠躬忏悔，

也有人为自己过去对父亲的错误处理

向妈妈深深道歉……

然而，

所有这廉价的一切，

又怎能抵消的了

一个老共产党员十八年来

遭受的冤屈、摧残、磨难？……

哀乐阵阵，

思绪绵绵，  
但愿八宝山今后能少一些冤鬼，  
这将是父亲和我们的共同心愿！  
哀乐阵阵，  
思绪绵绵，  
我们就这样送走了敬爱的父亲，  
思念之情  
将伴随我们永远永远……

